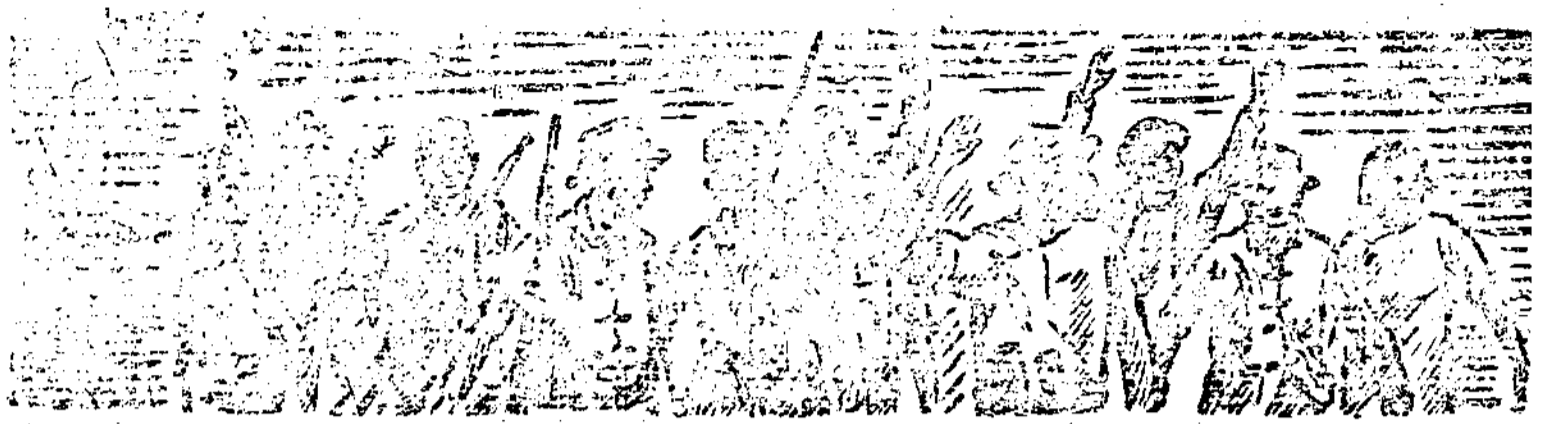


# 新華日報

第十卷 第十期  
目錄

論新華日報的出版	一
論新華日報的宣傳	二
論新華日報的組織	三
論新華日報的領導	四
論新華日報的紀律	五
論新華日報的團結	六
論新華日報的進步	七
論新華日報的奮鬥	八
論新華日報的勝利	九
論新華日報的未來	十

新華日報社編印



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基礎 (代誌)

挽救當前的經濟危機 (社論)

國共會談紀要

論軍隊國家化

農民在解放中

論愛國

戰後時期美孤立、帝國主義的威脅

馬克思怎樣學習的

論科學預見(一)

書評及其他

拉鐵摩爾論如何解決亞洲問題

晉察冀行進

(八三三)

(六八三)

(六八五)

于懷 (六八七)

李侯森 (六九五)

巴爾博斯基譯 (六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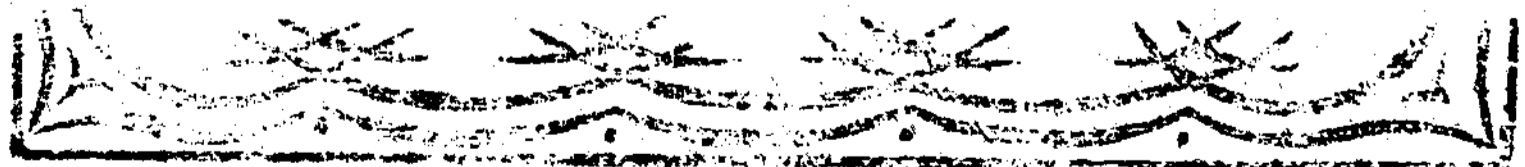
W·福斯特作 (七〇三)

M·格略塞爾作 (七〇七)

華西里也夫作 (七一〇)

D·華思 (七一三)

周而復 (七一七)



# 代論

## 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基礎

### ——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談的結果

全國人民，全國各黨派，對於各黨派及其人民所熱烈關心的國共商談，現在已告一段落。毛澤東同志於昨日抵達延安，雙方代表並已共同簽字發表「會談紀要」。商談經過情形如何，其結果又如何，那些問題業已解決，那些問題尚待商酌，這一切均已明白於世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到，這次毛澤東同志將主席之盛情而遠道而來，雙方代表在此重大時機會談月餘，並不是單方清談，各方面的熱烈氣氛也並沒有落空。這次會談的內容確不只是關於國際間利害關係的問題，而是有關全國範圍的民主進步，有關全國人民自由幸福的事。這次會談的結果對於保障和平，推動民主，加強團結，促進統一都有極重要的作用。

第一，在延安雙方共同發表的「會談紀要」中，首先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方針」這符合世界潮流，也是符合全國各黨派和廣大人民的願望的。抗戰勝利結束後，不應再有內戰，中國必須進入一個和平建國的新時期；這固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但我們試回想一下，在八年前，從內戰時期轉入團結抗戰時期，那也不是容易的事，但畢竟能實現了。今天的大勢所趨，比八年前對於和平的條件，更趨有利，縱使今日的問題比當年更大，但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和平建國也一定能實現的。在和平建國時期中共坦率表示願意繼續承認主席的領導，承認國民黨的地位，並繼續採取長期合作的方針；政府方面已同意這個基方針，並承認減平等合法，這正是建立和平的有力保證。也應承認這個基方針，中共代表對於各項具體問題提出若干主張，做了若干開明的進步，已經得到商談的各黨派都是足以保障和平，其未得圓滿的，也已奠定了今後尋求合理解決途徑的基礎。我們相信，根據和平建國的總方針，一切問題，是能够逐步獲得解決的。

第二，這次商談的結果，對於推動民主，是有顯著的貢獻的。中共的主張雖然從立即結束黨治進步到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先行召開政治協商會，自以會談的召開，自能有助於民主的推動。現在國民大會勢已不能

如原定日期召開，我們希望這個問題能够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得到合於民主原則的解決。「會談紀要」中的第四至第八項都是已得共同協議的民主實施問題。最近時期來，政府當局已在大後方地區取消言論出版檢查制度，並解放了某些集中營，這些有益於民主的事都是值得歡迎的。現在商談結果既已公布，我們希望當局立即採取切實步驟，保障人民的全部自由，廢止或修正一切限制自由的法令，正式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取消中統軍統的特權權力和特務活動，立即釋放政治犯，并在各地方開始實行自由的普選。那裏更能使民主的實施得到良好的開始。至於在抗戰勝利中的解放區內，人民已經得到充分自由，且已建立了民選的地方政府。在實施民主的總方針下，解放區人民所已經得到的權利自不應縮減，而應加以合法保障，民選地方政府的制度自不應取消，而應加以加強，更應在廣大民主基礎上進行。

第三，國內的團結因這次會商而加強是顯而易見的。這次會商經過及其結果都足以表現雙方共謀團結的精神。毛澤東同志不遠千里而來，顯然是出於至誠和大信，來後承蔣主席熱烈款待，與蔣主席多次會談，亦都融洽無間，而雙方派出代表，進行商談，中間雖然有過停頓，但從沒有喪失他們加強團結的信心，並始終保持友好和禮的禮節。昨日毛澤東同志返延，更蒙張治中先生陪送，盛情尤為可感。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相信，今後也一定會保持同樣的團結精神繼續商談的。「會談紀要」中最後一點，是在抗戰勝利後的最迫切的現實問題，也是有關團結的問題。我們認為，漢奸受法律制裁，偽軍解散帶受慎重處理，這些本無問題，希望政府速即明白領袖符合人民願望懲治奸偽的法令和辦法，並即認真執行，以息人民的憂慮，而使得一切奸偽都不能改頭換面，繼續為非作歹，甚至拿游武裝，進攻解放區，以致影響到國內的團結。冀冀受降地區的困難，也是同樣，讓一部分日寇軍隊仍能有藉口，武裝行動，以遂其破壞中國團結的陰謀，這種不幸現象是必須趕快結束的了。關於解放區軍隊與解放區地方政府的問題，現在大家都可

看到，中共方面已做了極大的讓步，繼續進行協商，以更加强團結而實現和平民主，這正是今後要做的事。

第四，說到統一，誰都知道，中國必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才能長期建設，這是真理，而有了和平民主團結，也就一定能有一統。中國所需要的統一正如孫中山先生一生所主張的，是和平的統一，民主的統一，而不是武力的統一，專制的統一。有了民主，還要有集中，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這次會商的全部過程都表現着共同協商，集中領導的精神，也就是民主的統一的精神。在「會談紀要」中，不論政治協商會議，不論民主自由，不論整編軍隊，不論地方自治，都可看出是在力謀政治命令之統一的。現在，中共及其他方面都承認國民政府與蔣主席的領導，中共更在協商中，贊助政府，力謀政治命令之統一。那麼，只要繼續鞏固和擴大共同協商的精神，中國走向完全的統一是不成問題的。

以上說的，是這次會談中的積極成果。今後要保持和發揚這些成果，使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更能鞏固發展和加強，是否已沒有困難了呢？不，應該承認，困難是有的，而且還可能有很大的困難。但是有了這次國共商談

的成就做基礎，加上雙方繼續的努力，和全國各黨派，社會賢達，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切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在月餘來的商談期中，有人因為不明真相或誤信謠言而致悲觀失望，以為商談決不能有好結果，現在實際情形已經完全揭曉，疑慮和失望是應該代之以努力和信心的了。但也許還有人因為商談至今仍有不少重要問題未得協議而失望的，那麼我們必須指出，這種失望也是不對的。要知道，中國的問題從來就是複雜錯綜的，要求人們以堅忍耐煩的精神，不懈不倦的努力來解決他。一步不能登天，八十多天的時間，雖然不短，但也決不能把一切困難一掃而淨。我們應該尊重政府與中共雙方代表經過這多少天的努力所已得的成就和已奠定的基礎，用人民的力量繼續努力，準備克服任何困難，那麼，我們深信前途固然還會經過多少困難和迂迴，但和平團結、民主統一，必能打破一切困難，通過一切迂迴而大放光明，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是終究要實現的。

因此，我們認為，月餘來蔣主席與毛澤東同志的會晤，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商談，是一件歷史上的大事。「會談紀要」正在第十節於重慶簽字發表，這的確是值得全國人民來雙重慶祝的。（新華十月十二日）

# 社論

## 挽救當前的經濟危機

經濟日趨的投降，經濟危機在各地擴展起來了。大後方就是這樣，收復區亦是這樣。

這種危機的形態，是與戰時不同的。抗戰的後半期，後方經濟，差不多完全沉沒在不景氣的深淵裡。戰時經濟危機的特點，是物價暴漲，而戰後的經濟危機，則為物價驟跌，失業驟增。物價暴漲的時候，雖然社會購買力被壓得更低，但國戶與商店，總可在提高價格中獲得其補償，到了物價驟跌的時候，局面就更惡了。在通貨膨脹和不合理的稅制之下，社會購買力是無法提高的。物價跌，銷路依

然停滯，但成本和子金的損失，就無法避免了。今天在後方各地所發生的現象，就是如此。

大後方目前的經濟，是戰時經濟的「反動」。百貨、布疋、西藥、綉料以至一些出口，都走着下坡路；黃金和美鈔日來雖有起色，但比起它在飛黃騰達的時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就是糧食，亦有江河日下之勢。這些情形，指明：商業因商品跌價而破產，銀行因做貸及資金而陷於破產；工業呢，商品跌價了，銷路斷絕了，它們就不能不關門。如果從糧食及一般農產品的跌價去推測，則中農

小農之破產，亦是顯而易見的，後方經濟危機的瀰漫，是籠罩着各個部門了。

其在收復區，物價的指標，雖與大後方不同，走着另一個路向，但危機的本質，却無二致。從八月中旬起，上海南京以至武漢一帶的物價，不斷上昇，九月下半月比九月上半月高了一倍以上。如果把收復區的物價來與後方相比，那是便宜得很多的。

其所以如此，則是因為法幣與偽幣的比率，似乎規定得過高。在另一方面，大後方有特殊力量的人，正利用這有利的比率，把大量法幣到收復區去發「勝利財」。法幣由後方運往收復區，而商品則由收復區流入大後方，這麼一來，大後方的物價就會跌得更兇而收復區的物價就會逐步昇了。收復區的物價之漲，使當地人民的生計更加痛苦。物價漲而偽幣與法幣的比率規定得太低，這是一點；因為接收工作之拖延，因為當局忙於接收物資，許許多多的工廠停頓了，許許多多工人失業了。這是更重要

的一點。上海一處的失業工人就達到五十萬人。

在物價趨向上，大後方與收復區是不同的，但從人民的生活來看，從市場之枯竭來看，從工商的破產來看，和從金融市場之枯竭來看，大後方與收復區在這些問題的實質上是相同的。

造成大後方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戰事結束，戰爭的需要停止，同時，封鎖的威脅亦告解除了。封鎖解除，囤積居奇的條件之一亦就消失了。這就促進了投機因素的改變。大家都願存錢而不存貨，於是法幣流通的速度亦就比以前過緩了。通貨流通速度之降低，可以相對沖淡發行數量之增加。這又是促進物價之下降的。除此之外，收復區物價之內流與人民的購買力之枯竭，都是與物價暴跌有關的。

後方這種經濟危機，並非與戰時經濟無關。由於戰時的財政經濟，不但不肯在生產上自力更生，而以發鈔和依靠外援為能事，甚且在發展國家資本的藉口（其實是發展官僚資本）之下，對於民間生產事業，給與種種的束縛和不合理的負擔。於是生產日益衰落，物資日益缺乏，囤積投機之風亦就越來越甚。在這種，通貨的巨量發行，推動了物價，物價的上漲又增加了通貨之發行。於是法幣漸天飛了。人們對於指理資金的辦法，是以黃金投機代替商品投機。整個後方就在投機的大海中行浪。一旦戰事結束，囤積居奇的條件消失時，囤戶和銀行一齊潰散了，銀根亦跟着緊迫起來了。銀根緊，促使囤戶拋賣黃金，整個市面，都陷入動蕩之中。在這種，本來半生不死的工廠，就無法不在虧利聲中

倒下去；千千萬萬的工友，就必然在勝利聲中失業了！至於收復區之經濟混亂，亦是人禍所造成功的。漢奸政人可以維持治安，欽差大臣只潛心於發「勝利財」。像解放區那樣的動員人民迅速恢復生產的做法，當然是不會有的。搶官職、搶地位、搶物資，發橫財的醜劇，正層出不窮的在收復區的每一個角落演出。像這樣，工廠怎能不停頓，市況怎能不蕭條呢？一切都是人禍！

這樣的經濟危機，有什麼影響呢？當然，影響是有的，這就是：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業破產的災難，殘酷的打擊了他們；其次，戰時的一點經濟建設，完全被摧毀了，無數的中小生產，正在銷路無着資金困迫的淪陷中閉門；再其次，現在因淪陷區變成收復區，法幣的流通量擴大了，與偽幣來比較，法幣的價值提高了，這樣便更大量的說下去。因為有種種條件的牽制，通貨膨脹似乎感覺不出來，但是，「發行」的列車，如果使足馬力的開下去，則全國性的最高度的惡性膨脹，終會有一天隆隆爆發起來的。更深刻的財政危機，正在前面啊！

戰後的經濟危機，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現在的美國亦已開始受到恐慌的威脅了。英國邱吉爾之下台，其原因之一不也是因為國內社會經濟問題尖銳化之所致嗎？但，中國是有它的特點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它的經濟結構是與英美不同的，故它的恐慌，處處表露它的買辦性和前資本主義性。因之，指理當前這恐慌的途徑，更

非頭痛醫頭痛醫脚所能奏效。例如要求國家銀行發行本票，收購黃金及收回公債的辦法，要求政府增加工資及商業貸款的辦法，未曾沒有作用，但它們只是一些治標的辦法而已。發本票收黃金，只能使金融的枯竭，暫時得到滋潤，增加工資與商業貸款更重要的作用，對於民族工業應有盡有的合理的政策，國家辦不了的，應讓民間資本經營，同時應立即停止只有官家才能接受做偽工廠與財產的不合理辦法；在稅制上，應該給與產業資本以極大的便利與保障；在金融上，應該使銀行面向生產；在交通上，應該做到貨暢其流，不再有留難滯留情事。英美今天所怕的生產得太多，而中國所患的是生產得

太少。故對付這個經濟危機，緊縮生產絕不是辦法。但要使工業能有銷路，就必須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在這，二五減租和減賦的初步土地改革，是必須馬上實行。沒有削弱封建剝削，沒有減輕農民負擔，沒有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與購買能力，則工業化便失去了前提。

然而，要使這一切，能見諸實行，實有待於黨衆期待的切實的民主改革之實現。沒有真正的民主改革為前提，二五減租就成爲紙上空談；沒有真正的民主改革和切實的土地改革，則所謂工業化，就會成爲外資和官僚買辦建築他們的樂園的途徑。在那種情況下，「復員」真變成了一「復原」，而經濟危機亦只有在拖的過程中不斷發展下去了！

十

# 國共會談紀要

中國國民政府蔣主席於抗戰勝利後，邀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先生，商討國家大計。毛先生於八月二十八日應邀來滬，謁見蔣主席，會作多次會談；同時雙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為王世杰、張羣、張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為周恩來、王若飛兩先生，雙方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商談，已獲得左列之結果，並仍將在互信互讓之基礎上，繼續商談，求得圓滿之解決。茲特發表會談紀要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緊決避繁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選舉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議程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選國民大會代表案，延緩國民大會召開日期，及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和五五憲法草案等三項主張；政府方面表示：國民大會已選出之代表，應為有效，其名額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決，五五憲法草案原曾發動各界研討，貢獻修改意見，因此雙方未能成立協議。但中共方面聲明，中共不願見因此項問題之爭論而破裂團結，同時雙方均同意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之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國

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為憲政常軌，今可即行承認。

六、關於特務機關問題：雙方同意政府應嚴禁特務機關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

七、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除滿行以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八、關於地方自治問題：雙方同意各地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

九、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並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的部隊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海峽



以北及蘇北等處的解放區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計劃正在進行，此次提出之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為二十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關於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討論決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軍事人員，應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應保障軍事制度，任用原部隊人員為整編後的部隊的各級官佐，編官佐應實行分區訓練，設立公平合理的補給制度，並確定政治教育計劃，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項均無問題，亦願商榷詳細辦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區民兵應一律編為地方自衛隊；政府方面表示：祇能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為具體計劃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進行之。

### 十、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區名詞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應感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方面開始提出的方案為：依照現有十八個解放區的情形，重劃省區和行政區，並即以原由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劃省區，變動太大，必須通盤籌劃，非短時間所能決定。同時政府方面表示：依據蔣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國軍令政令統一之後，中央可考慮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選，收復區內原任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為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於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種解決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員為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六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員為省府副主席及委員（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廣大解放區，或有部份解放區），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特別市，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副市長，於東北各省容許中共推選之人參加行政。此事討論多次後，中共方面對上述提議，有所修改，請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員者，改為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四省，請委任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改為晉綏兩省，請委任副市長者，改為平、津、青島三特別市。政府方面對此表示：中共對於抗戰卓著勳勞，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薦某某省主席及委員，某某省副主席等，則即非真誠做副軍令政令之統一。於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棄第二種主張，改提第三種解決方案，由解放區各級民選之政府，重新舉行人民普選，在政治統一之

員監督之下，歡迎各黨派、各界人士踴躍參加選舉，凡一縣有過半數選民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縣級民選，凡一省或一行政區有過半數縣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省級或行政區級民選，選出之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種省區加委方式，乃非謀政令之統一，惟縣級民選加委可以考慮，而省級民選須待憲法頒布，省的地位確定以後，方可實施，目前祇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復常態。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種解決方案：各解放區暫維持現狀不變，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而目前則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和平秩序之恢復。同時中共方面認為可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解決。政府方面則以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此項問題久懸不決，慮為和平建設之障礙，仍亟盼能商榷具體解決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繼續商談。

### 十一、關於奸偽問題：

中共方面提出：嚴懲漢奸，解散偽軍；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則上自無問題，惟懲治漢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偽軍亦須妥慎辦理，以免影響當地安寧。

### 十二、關於受降問題：

中共方面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慶紀念日於重慶

王世杰

此處留有空隙以備張羣補簽

張治中

邵力子

周恩來

王若飛



# 論軍隊國家化

于懷

## 一 軍隊國家化的前提

除掉極少數的例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贊成軍隊國家化和國家民主化這兩大原則的。但問題在，這兩大原則之間的相互關係究竟是事實怎樣和應該怎樣呢？

從形式邏輯出發，這兩大原則的關係有如下可能的三種：

第一種：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軍隊不國家化，國家是不可民主化的。

第二種：軍隊國家化與國家民主化是平行的，軍隊國家化能進行到什麼程度，要看國家民主化到什麼程度；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國家民主化到什麼程度要看軍隊國家化的程度。這兩種在本質上對立的理論，可以概括到一種簡約的說法，即：軍隊國家化與國家民主化這兩大原則都對，都須同時進行。

第三種：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只有國家真正的民主化了，軍隊才能真正地國家化，而不是化給一個非民主的個人或集團。

從形式的觀點出發，這兩大原則的相互關係可能有如上三種；在實際生活中，的確也有代表這三種不同看法的人。但，這只是表面的；實質上，這兩大原則的關係只可能有兩種不同的關係，即：

要麼是：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

或者是：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平行論者表面上雖然好像是折衷了兩者，但實際上他必須站在前一種立場或後一種立場的。

假如是認為軍隊國家化進行到什麼程度要看國家民主化的程度的話，那麼，他就是在實際上承認了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假如是認為國家民主化到什麼程度要看軍隊國家化的程度的話，那麼，他就在實際上接受了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在這裏，理論上固然沒有含糊。在實際生活中，問題最後仍是不可能含有含糊的。

這樣，我們就必須決定，究竟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呢，還是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

問題到了這裡，形式邏輯便不中用了。國家民主化，這是一面具體的代或確定事實的概念，而軍隊國家化卻不如此，它沒有表明是什麼軍隊化到什麼國家化去；是對建軍國家化於封建國家嗎？是對建軍國家化於民主國家嗎？是民主軍隊化於封建國家嗎？是民主軍隊化於民主國家嗎？這就是一個軍隊國家化，完全不能給予任何確定的答覆，把國家民主化作為前提，那麼所謂軍隊國家化便有了意義；民主的軍隊固然要化於民主的國家，就是封建的軍隊也必須化於民主的國家——改革為民主的軍隊。反之，把軍隊國家化作為國家民主化的前提，那麼在實行軍隊國家化對的國家關係是未民主化的封建的國家，也就是說，不但封建的軍隊要化於封建的國家，就是民主的軍隊也要「化」於封建的國家——被封建的國家所消滅。因此，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上述的問題其實也就是我們贊成用武力統一來建立與支持一個民主的國家呢，還是贊成用和平（民主）統一來建立與支持一個民主的國家？因為堅持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的人，無論在理論或實際上必然走武力統一的道路。武力統一在今天不但是事實上統一不了國家，即今統一了也絕對不會使國家民主化，而只能使國家繼續封建化，而且正是因為國家在今天與今後不能武力統一，所以他那統一之後所要實行的民主云云也就說到水不實行的藉口了。

袁世凱是這樣沒有交代而下場的。曹錕是這樣沒有交代而下場的。吳佩孚是這樣沒有交代而下場的。但儘管有這許多人從武力統一的台子上滾下來，堅持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者，依然是在（我們）要承認一件事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他們說：

「總之，我們要求憲政圓滿實施，則必須舉國一致精誠團結，使德意志聯邦團結，必求軍事上的統一，其理至明，其義至簡」（本年五月十六日，成都黨軍日報社論：「再論團結與統一」）

那就是說：「要求憲政圓滿實施，必求軍事上的統一。」這是「其理至明，其義至簡」；我們老實說就看不出這「至明」的「理」和「至簡」的「義」來。首先所謂「統一」是統一在什麼基礎上呢？我們主張，還在六年以前，我們就主張：

「非統一於投降而統一於抗戰，非統一於分裂而統一於團結，非統一於倒退而統一於進步……」。我們並不是無條件地反對統一的，但是無條件的統一那不就是我們不敢苟同，而必須堅決反對的了。其次，為什麼一定要在軍隊國家化（無條件統一）了之後，才能開始國家民主化（圓滿實施憲政）呢？

這似乎並非一個「至明」的問題。於是，繞個圈子的回答來了：

「原則上，到了憲政時期，我國軍政軍令，固然是出自民選的中央政府，統一軍權問題似乎不難迎刃而解，殊不知，在軍前未統一以前，軍權分裂的國家，始終沒有所謂「憲法之治」，而祇有所謂「軍閥政治」，英美各國憲政之所以有光榮的歷史可說，是軍權從早就統一的結果，而其餘各國憲政之所以未着成效，也未嘗不是因為軍權沒有得到適當控制的緣故」（本年四月，胡秋原主編「民主政治」，彭瑞夫：「軍隊國家化與憲政」）。

英美是民主的宗邦，假如英美的只有存在軍權無條件統一了之後才能實施「憲法政治」，我們這一個才開始學習民主的國家豈非如此這般了。不少一知半解的學者以此而沾沾自喜，以為雖然有了這麼一變歷史根據，大概軍權必須統一（無條件統一），然後才能實施民主政治的理論法理也不會錯了。

且慢，且慢！讓我們也來翻翻歐洲民主國家的老賬。我們說，無論是在理論上和歷史上，軍權論斷是錯誤的；沒有絲毫歷史根據的。

在理論上，西歐先進諸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不是無條件地變成軍權統一，而是首先粉碎無條件的統一了的軍權（專制軍權）。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歐先進政治舞台的第一幕不是統一軍權而是分裂軍權，用代民民主制衡的軍權來對抗，分裂以後以至消滅那反動的絕對專制軍權。他

們不用統一軍權嗎？不，他們是主張統一軍權的，但統一是在國家民主化之後，而不是統一在國家民主化之前；統一在民主進步的基礎上而不是統一在專制獨裁的控制之下；那是有條件的統一，而不是無條件的統一。

在歷史上，事情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從一般的歷史發展來說：所謂統一的軍權在封建社會的初期實際上是有過的。只有當初期的封建社會解體，啟蒙的中心慢慢地從分散的封建的王侯轉移絕對專制的帝王手中的時候，所謂龐大的保衛部隊和統一的軍隊與軍權才在理論上成為可能和事實上實際發生。這種絕對專制的中央集權專制在某些地方也有些現代化的統一統一的國家，但它基本的封建專制的特質即廢除了新興的民主政治的對頭，因此，新起的民主力量，不能不在無限制地取了和這統一了的政權和軍權對抗的形式。這也就是為什麼比英國的民主政治更早的意大利的民主政治不能不採取地方性的政權和軍權以對抗中央集權專制政權和軍權的緣故。

其次，讓我們看一看巴力門的宗邦——英國，它在歷史上怎樣處理這一問題的。在查理一世，必須指出的是，作為英國十七世紀大革命的起因之一問題正是當時巴力門根本不承認英王有絕對的軍權，更不容許他有統轄民兵之權。早在大革命前六年的二八四二年，英倫的巴力門不僅是有了分裂軍權反對皇室的軍權的大不韙，而且要求英皇承認巴力門其獨自的統轄民兵之權。查理（查爾第一）有他統一了的常備軍，國會也他們並非愛英皇統治的民兵——這就是英國的憲法政治開始發台時「軍權分裂」的實際情形。我敢說也敢問：這有分裂軍權之名的英國民兵有助於英國的憲法政治呢，還是礙於英國的憲法政治？是不是有人認為，巴力門放棄了民兵，讓英皇統一，擁有常備軍的英皇就會自動地讓與憲法政治了呢？不是的，正好相反，在歷史上，正是因為英國的民主力量擁有民兵，它才敢在革命以後順利地展開憲法政治。

這「軍權分裂」的情形，由於英國的特殊情形，並未因革命成功而結束。這革命成功後在時期內，當時的保衛軍（查理第一）和自由軍（查理第一），因為英倫的軍權還沒有解除，始終沒有放棄過反對英皇統治有常備軍這一權利鬥爭。他們認為：這這等人民的民主權力，他們主張：如英國的保衛軍與常在二千至三千人之間，把這些常備軍置於國會管理之下，但國會不能調動英皇常備軍，怎麼辦呢？以保衛軍，以牙還牙。當及民主的力量採取武裝革命的時機，民主的力量一定也要武裝。因此他們組織民兵作為對抗英皇用

們不用統一軍權嗎？不，他們是主張統一軍權的，但統一是在國家民主化之後，而不是統一在國家民主化之前；統一在民主進步的基礎上而不是統一在專制獨裁的控制之下；那是有條件的統一，而不是無條件的統一。

軍隊來保障民主的保證，作為保障他生多國民主權利的保障。

有人以為：一個民主的政黨，不應該裝裝的政黨，一個政黨一旦武裝了，就不可能再叫作民主的政黨了。這一番話出之於一個歐洲人之口，聽來好像更有根據。但實際上，這是數典忘祖。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若說是武裝的政黨，在近代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民主政黨在當時就具備是擁有武裝的政黨。聽來奇怪，事實上，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當強大的武裝力量保障着絕對專制的政權，妨礙着國家民主化的時候，民主的力量不武裝自己，難道向專制力量投降嗎？只有武裝的革命才能打垮武裝的反革命，及革命的政權逼迫着革命力量武裝——這一歷史的法則不是東方的中國所特有的。

從英國巴力門的鬥爭史中，我們只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為了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在最初不是鞏固絕對專制的軍權；而是對抗乃至推翻絕對對專制的軍權；在這一過程中，武裝鬥爭的形式不僅是可能，實在有，而且幾乎是一定有的。然則，軍權不統一嗎？要統一的，但不是把人民的軍權統一在絕對專制的政權之下，而是把絕對專制的軍權統一在民主化了的政權之下。

這就是為什麼要完成真正的軍隊國家化（就是說，如今天絕大多數人民所要求的，把一切軍隊化於民主的國家），必須先完成國家民主化的緣故。假如這兩者都必須經過一個複雜而長期的過程才能實現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只有當國家民主化的過程真實地展開的時候，軍隊國家化才能一步一步的實現。

有人以為國家民主化是一個政治問題，應該取決於政治鬥爭，軍事問題究竟是軍事問題，武裝鬥爭總有些越出政治鬥爭的常軌。問題在那裡呢？問題在：我們今天正在爭取這條政治鬥爭的常軌，這條常軌直至今日還沒有在中國存在。政治鬥爭而不得不出之以武裝鬥爭的形式不是主觀願望不要的問題，而是決定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例如，在上面我們引證的十七世紀中英國議會鬥爭中，假使當時英王不用他的軍隊來威脅各民主黨派的權利的話，當時的保守黨和自由黨是沒有組織民兵的必要。不過假如有這種民兵的力量經常地以一個武裝力量的對壘而出現，而且成爲一個長時期中的必然現象的話，那麼，在這種條件下，爭民主的政治鬥爭只有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而且這一形式只有當反民主力量不復以武裝力量爲其維持反民主統治的主要工具的時候，它才相應地不復成爲爭民主的政治鬥爭的主要形式。這是中

國史發展的法則。

關於這一點，陶孟和先生有過一段很好的分析：

「政治鬥爭因政治制度及社會情況不同而形勢各異。在獨裁政治的，無論是個人或是黨派的，與民主政治之下的，其形勢固然各有不同。在貴族歷史上，平時從事政治鬥爭的，不外帝王、皇族、功臣、軍人、大吏、外戚、宦官、巨族、政客、官僚、儒生幾個重要份子。因時代不同，各份子主權的重要性不同。由他們合縱橫，爭奪傾軋，形成了政治鬥爭的種種方式。參加這些鬥爭的主要的個人或是個人團體，而結合成的形勢，人民是有份的。只有在一個專制統治衰微的時候，所謂黨派傾軋，等等而趨，政治鬥爭才出現了新的有特有力份子，人民才有積極的參加政治鬥爭的機會」（本年一月二十八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陶孟和「政治的鬥爭」）。到此為止其完全符合於客觀事實的。但陶先生要說：「但在這種鬥爭中，便已以武力爲工具，推翻政治鬥爭的規則，破壞政治鬥爭的傳統典範，而趨出於新的政治鬥爭範圍以外了」。從面也就不能說先生是政治鬥爭了。

現在的困難是：要麼就是沒有人民參加的政治鬥爭，要麼就是有人民參加，但已不能算是政治鬥爭了。究竟是中國歷史上中國人民一貫地破壞了政治鬥爭的規則呢？還是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和社會條件決定了中國人民的政治鬥爭必須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呢？

陶先生根據理論的推斷，認爲這種鬥爭不能算是政治鬥爭，因爲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破壞了政治鬥爭的規則；但實際上中國人民這種破壞政治鬥爭規則的政治鬥爭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規則，其所以如此，不是因爲人民不懂政治鬥爭的規則，而是中國歷史的專制統治者根本不讓中國人民有這種正規的政治鬥爭的可能。中國人民或者是根本不能起來，要起來只有一種「非正規」的鬥爭，就是揭竿而起；這是中國歷史下給中國人民的一份挑戰書。一代又一代地，中國人民決定了一揭竿而起；這並不是因爲他們有愛子「揭竿」，而是因爲在歷代專制帝王深重壓迫之下，不「揭竿」他們就根本起不來啊！

而且，所謂政治鬥爭的規則又是根據什麼說的呢？很顯然的真正政治鬥爭必定是有千百萬人民大眾積極參加的一種政治鬥爭，這是絕對對專制的；因爲，非然者由那些「個人」或「個人的感情利害」所結合成的「私黨」之間的「合縱連橫」、「黨門傾軋」、「爭奪傾軋」

，而「人民沒有份的」，無原則的鬥爭也算是真正的政治鬥爭了。很顯然，這種無原則、無目的的鬥爭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政治鬥爭。

因此真正的政治鬥爭必須是有人民積極參加的一種政治鬥爭。這是所有一切有意義的政治鬥爭的內容及其實質；離開這一內容和實質，它就不成其為真正的政治鬥爭了。這是一條標準，內容的標準。其次，它採取什麼形式呢？

以歐洲議會必須採取議會鬥爭的形式才是政治鬥爭的人，其心目中的標準十之八九是英美的政黨政治。但他忽視了，這種議會鬥爭的形式即在「向來形成之前，歐洲的民主政治在某一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具體條件之下，是同樣經過過武裝鬥爭來的。這還不清楚嗎？要使議會鬥爭可能，先得要有一個不受軍閥威脅的議會和言論集會結社的資本民主自由，而我們今天還沒及於此。所謂軍閥這一些基本自由啊！

假如說，民主運動在歐洲採取武裝鬥爭形式的時間短，而在中國所經歷的時間却為什麼這樣長呢？那是因為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社會是這樣的一個歷史和這樣的一個社會。這就決定了在長時期內必須有這樣一種鬥爭形式。不少人埋怨中國的民主鬥爭採取武裝鬥爭的時間太長，他們忘記了人民無非；他們怨了，他們應該埋怨那些阻止國家民主化的人是那樣的兇狠以致使我們的國家不能迅速民主化，而必須經歷一個很長而痛苦而流血的過程。現在我們爭取國家民主化，就是為了縮短這一流血而痛苦的过程。中國人民的血流得太多了，誰再願意這過程多延長一天一日？

## 二 何謂軍隊國家化

什麼叫軍隊國家化？或者說，什麼樣的軍隊才是國家化的軍隊，什麼樣的軍隊不是國家化的軍隊？

在這種，我們必須再一次的具體規定一下所謂軍隊國家化的具體含義。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軍隊也好國家也好，都有封建民主之別（當然還有其他歷史性質的軍隊與國家，這裡不來說它），林林這道區別，問題就毫無意義。舉例說，中國的秦始皇，外國的希特勒，他們也統帥他們的軍隊是國家化的，但是我們今天這種所謂國家化的軍隊嗎？我們能承認他們的軍隊是國家化嗎？當然不能。我們今天所說的軍隊國家化，是把軍隊化於民主的國家，

而不是化於任何其他國家。

因此，我們這所說的軍隊國家化的國家，既不是絕對專制的國家，也不是法西斯獨裁的國家，而是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因為只有一種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才是能代表這一個國家廣大人民真正的國家。

然而，什麼樣的軍隊才是國家化的軍隊呢？和我們這所說的國家，有四種主要的軍隊應該區別開來：

- 一、封建的地方性的軍隊
- 二、封建的中央性的軍隊
- 三、人民的地方性的軍隊
- 四、民主國家的中央性的軍隊

這四種軍隊有什麼差別呢？不是所有地方性的軍隊都是封建性的軍隊，不是一切中央性的軍隊都是國家化的軍隊，而真正民主國家化的軍隊一類的却正是從地方性的軍隊開始的。

問題的關鍵在那裡呢？

第一，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秩序。大規模的軍隊在封建歷史中出現的時候是封建社會發展到絕對專制王朝的時候。在絕對專制王朝出現以前，那時的所謂軍隊不過是君主侯爵的私人武士而已，由於封建經濟的限制，這軍隊的規模是不可能太大的。這就必然的註定了，它是一種地方性的附屬於封建領主的武裝力量。這軍隊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只有一個：忠於王侯和保護領主的利益。除此而外，它是沒有任何額外的目的。到了封建社會的第二期，隨著絕對專制王朝的發達，以募兵制為基礎的大規模的封建軍隊才在歷史上出現。這種大規模的封建軍隊之何以可能的呢？由於封建社會進入絕對專制期的第二期，一方面由於封建制度的開始破壞，大批的農民人口從封建村莊中流離出來；另一方面由於市工業和國內商業的逐漸興起吸收了一部份從農村中流離出來的人口；由城市工商業興起的速度趕不上封建村莊的破壞速度，城市工商業吸收不了從農村中排除出來的全部人口，于是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大批的流離者。一定的和經常的流離的農民羣，這就形成了封建帝王侯爵軍隊的基礎。其次，由於封建式的合併和城市的興起，專制王朝的經濟收入增加了，這增加了的收入就形成了封建帝王侯爵軍隊的軍費來源。最後，絕對專制王朝對建王朝，雖然按其本質說，不過是許多封建王朝中最大的一個王朝而已，

在表面上它是趨于統一的，因此所謂軍權是統一在他的手裡的；雖然這固統一在歷史上的趨向是趨于不穩定的。

但由於這種軍隊雖然在名義上是自命為屬於國家的統一的中央性的軍隊，但實際上是和人民利益對立的一種軍隊，所以它始終不能順利地解決：

一、兵源問題

二、軍費問題

三、軍權問題

這三大問題實際上就是專制軍隊的三大基本矛盾和三大致命傷。秦漢以來中國兩千年的歷史證明了，絕對專制的封建帝王是命定了解決不了這些軍大問題的。

按照每一個國家具體的歷史情況不同，一個封建的絕對專制的政權，意是能用別的方法來維持它的統治，愈是不得不更多的仰仗于它的專制軍隊。在這種情況下，新起的民主力量，就不得不以那統一了的專制軍隊為革命的對象。這樣就產生了民主革命初期，英國的民主階級組織民兵（Militia），法國的民主階級組織國家自衛兵（National Guard）來對抗那中央性的統一的專制的軍隊的情況。什麼是民兵和國家自衛軍呢？這些人民的武裝，在它初起的時候都不是中央性的軍隊，它們都是地方性的力量。英國的民兵是按照郡（County）單位由人民自願組織起來的，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國家自衛軍是按照區單位由人民自願組織起來的。把看守帝制大門的法王度中央性的專制軍隊打垮的正是巴黎的地方性的部隊。假如說所有地方性的部隊都是封建性的軍隊，我們能說英國的民兵和法國的國家自衛軍是封建性的軍隊嗎？不，不能這樣說，正是這些地方性的軍隊才是英法軍隊國家化的基礎和核心。

近代中國的歷史，更豐富的更尖銳的證明了這個規律。滿清皇朝的軍隊是統一的封建的軍隊。太平天國與辛亥各省起義的軍隊先後破壞了這個統一，它們的軍隊是地方性的，但却是帶着民主性的。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繼袁世凱到曹錕吳佩孚的軍隊也是中央性的封建的軍隊，而孫中山先生在廣東所訓練的革命軍是地方性的。孫中山先生所開始訓練的軍隊，其革命的傳統到今天的一百二十萬人民軍隊所繼承。今天人民的軍隊也還是地方性的，但任何公平的觀察者都不能不承認這是中國今天最好的軍隊。因為它只屬於人民。而不論於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的集團。正是這地方性的軍隊才是中國軍隊國家化的基礎和核心。

因此，我們就必須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不是所有地方性的軍隊是封建性的軍隊，不是所有中央性的軍隊是國家化的軍隊，我們必須區別出兩種性質完全對立的地方性軍隊和中央性軍隊，單看地方性或是中央性這一形式的規定，是完全不能決定問題的。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檢討：既然地方性和中央性這形式的規定不能區別出什麼是國家化的軍隊，那麼，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追究究竟什麼是國家化的軍隊和非國家化的軍隊之間的差別呢？於是問題就發展到：

第二，必須從實質上來區別一個軍隊究竟是屬於那一種範疇。

有一種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理論說，世界上有一種軍隊是超然于政治利害之上的，他們說這種超然的軍隊就是國家化的軍隊。但實際上，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或是那一個歷史時期，這種超然於政治利害之外的軍隊是不會有過的，在過去不會有，在將來也是不會有的。和這種理論相反，在歷史上，任何軍隊都追求着一種政治利益，這種它所追求的政治利益正是決定一個軍隊的性質的決定性的因素。

封建王侯的軍隊——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是保衛封建領主的剝削和統治帝王的專制統治。

絕對專制的軍隊——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是維持封建的社會秩序和封建帝王的專制統治。

這兩種軍隊，不管它在形式上或存在形態上，呈現出怎樣的的不同；在其基本性質上，都是屬於一類的為私人所有的封建軍隊。

但近代的國家化的軍隊是和此不同的。它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和屬於人民的一種民主化的軍隊。只有這樣的軍隊才能順利的解決幾千年來專制帝王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兵源問題，軍費問題和軍權問題。

一個軍隊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不僅決定着它的本性質，而且還決定着它怎樣解決兵源軍費和軍權等所有問題的方法和形態。

一般的說：封建社會初期的軍隊，問題是比較少的，因為那時封建的王侯們經濟力量有限，軍隊的兵源大部份是他們自己的。而武士，再不多不過是臨時找出的僱傭奴為家臣武士們訓練而己。在這種情況下，兵源軍費和軍權都不大發生問題；兵源限於家臣武士，軍費限於家臣貢獻，軍權限於指揮數十人而已。

封建軍隊的矛盾到了絕對專制時候才充分地展開。

首先是在兵源上。因為專制帝王並無一個正大的政治目的，足以鼓舞人

民去自願地從軍，他的軍隊的來源不能不仰仗於募兵制度；以金錢去利誘人民當兵的募兵制度有時又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於是又不得不利用暴力去威脅人民當兵的拉夫制以補充。跟隨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一個專制軍隊在兵源問題上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出來。好錢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這是中國人民對於專制軍隊如何補充兵源的咒詛。

其次，是在軍費上。由於專制帝王的私慾無窮，往往無節制地擴充軍隊，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和人民的負擔能力是不能隨着這種無止境的擴軍要求而增加的，因此一個專制帝王的窮兵黷武的結果往往就是民窮財盡。「至窮食粟」——這是中國歷史對於這批野心帝王如何籌措軍費的警告。

然而專制軍隊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應該說是最合理的問題，這是軍權問題。所謂馬上得天下，意思就是說有了軍權就有了天下，但是能得天下，能爲什麼不守呢？「可取而代也！」這就是已經得了天下的中國專制帝王爲什麼不得不想千方百計去保持他的軍權的原因，但究竟因爲這種軍隊一開始就是沒有一個爲國爲民的目標，儘管千方百計，也總是依然保持不住的。

然而對於專制帝王的軍權威脅最大的，不是什麼封建割據的舊勢力，而是新生的民主勢力。爲了對抗這絕對專制的軍權，新生的民主的力量在歷史上第一次地組織了那真正是來自人民，爲了人民和屬於人民的軍隊。

這「爲了人民」的政治目標規定了這一人民軍隊的基本性質及其構成。在初期，首先是自願地來自人民，解決了兵源問題。人民的軍隊一開始就不向於專制軍隊的地方，它是由人民自願組織起來的，它在基本上是自願兵，而封建的絕對專制的軍隊所採取的却是利誘的募兵制和威脅的拉夫制。爲什麼人民的軍隊能這樣做，而專制的軍隊不能這樣做呢？這就是因爲它有一個爲國爲民的巨大的政治目標，它是服務於現實的民主鬥爭，爲了爭取和保障民主權利而存在的。因爲它是「爲了人民」的，所以它能夠源源不斷地自動地來自人民。

其次，正如爲「爲了人民」的政治目標解決它的兵源問題一樣，這一目標同樣的解決了它的軍費問題。軍費的籌措本來是絕對專制末期、新起民主階層限制封建帝王擴充專制軍隊和控制專制軍隊的有力的工具之一。但是對於人民自己的軍隊，軍費問題却迎刃而解了。當軍隊不是「爲了人民」的時候，軍隊對於人民的生產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因爲消費的人多了，生產的人少了。但是「爲了人民」的軍隊却完全與此不同，他們不僅不妨礙生產，而

且幫助了生產。在兩種意識上他們幫助生產：維護之民的民主權利，他們幫助地幫助了生產；用具體的力量自己生產，或者幫助人民生產，他們幫助地幫助了生產。他們是人民的武裝，他們是武裝了的人民，他們是「民兵」。這也就是爲什麼這軍隊在一定時期不能夠脫離他們所居住的特定地區而必須是所謂地方性軍隊的原因之一。

通常人有一種誤解，以爲：附屬於某一個地區的地方性軍隊，就一定是封建性的軍隊；而可以調動自如的常備軍就必然是國家化的軍隊；從而說：地方性軍隊和中央性軍隊的對立就是封建軍隊和國家軍隊的對立。事實上，這不僅是在理論上完全錯誤，而且是在歷史上也是毫無根據的。

在歐洲的歷史中，最初組織近代性軍隊的是十三世紀前後的大利城市。這些自治的城市，由於長期開對專制王朝的鬥爭，產生了若干民兵組織。爲了保證這些既得的民主權利，他們組織了自己的軍隊，這種軍隊的組織目標既然是保護這些城市的民主權利，很顯然就一開始便是不附屬於封建的部隊，而專制王朝反對的常備軍反是國家化的軍隊嗎？不，正好相反，那些調動自如和人民對立的常備軍才是真正的封建軍隊，而那些附屬於地方及其人民的自治城市的部隊才是真正的國家化的軍隊。這是一種適應時代的不得已的情況，但誰能說不是因爲這一些自治城市的取得民主權利的時候受着武力的威脅，它們的軍隊顯然是沒有附屬於這些特定地方的必要呢。

最後，「爲了人民」的政治目標同樣的解決了軍權問題。軍權問題誰呢？屬於人民，當軍隊從專制帝王完全轉移到人民手中的時候，也就屬於國家。這一種基本上是「爲人民」的目的同時也就使得軍隊內部的民主生活成爲可能。這是和絕對專制的軍隊完全相反的。絕對專制的軍隊只講服從的服從，而認爲軍隊民主化一事是完全不可想像，但人民的軍隊却恰恰相反，他們以爲只有一個民主化的軍隊才是真正的國家化的軍隊，這種軍隊是自覺的組織。

從來專制帝王控制軍隊的辦法通過控制軍官。從中國來說，過去於專制帝王是如此，民元以後的軍閥同樣是如此。北洋軍閥之起家得力於小部隊，士官學校和其他各種軍事學校的控制成爲軍閥以來大小軍閥們發展的不二法門。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中按照民主原則的組織制度就成爲不可想像的。中上級軍官既然是由上而下，而且軍閥早就內化了，怎麼可能組織這種軍隊、帶兵和指揮作戰成續來決定他的實和聲、功和過、聲和聲譽、人民



的軍隊是與此相反的。這自拿破倫所領導的法國大革命起，近至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軍和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人民軍隊都是一反這種軍隊內部的階級制度的。在這些部隊裡，官兵的關係是民主的，軍官的權限是憑實實在在的軍功，而不是憑個人的派系關係的。

這就是那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和屬於人民的國家化的軍隊的真面目。因為它是來自人民的，所以它的兵源不成問題，它和人民的關係有如魚之得水。

因為它是為了人民的，所以它的軍費不成問題，它不僅不妨礙人民生產，而且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生產。

因為它是屬於人民的，所以它的軍權一開始就是取決於人民的。在它的內部有對豐富的民主生活，它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但是它的紀律不是強迫的，而是自覺的。

這種軍隊在平時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護國內的民主和平；在戰時能保障國家取得光輝的勝利。它不僅是為了保障民主制度而存在，它是真正民主制度有檢的一部份。任何民主的制度，假如沒有人民的軍隊作為它有機構的一部份，那民主制就是不完整的殘廢的。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國家化的軍隊和非國家化的軍隊的區別不在於它的形式是地方性的軍隊或是中央性的軍隊，從而軍隊國家化的意義不是簡單的把地方性的軍隊收編為中央性的軍隊。恰恰相反，歷史上不少的例子，絕對專制的帝王去消滅進步民主的軍隊是假軍隊國家化之名而行；自命為軍隊國家化，其實不過是軍隊私人化而已。

◎國家化的軍隊和非國家化的軍隊，其差別不在其表面的存在形態，而在於它的政治實質。從而軍隊國家化的意義必然是把那些在實質上和人民對立的軍隊轉化為「與人民相結合」的軍隊。

◎這一轉化過程不是發一紙聲明和改換幾個機構，就可能完成的；它必須在從兵源問題一直到中上級軍官各種制度上，經過一番長而漸進的改革。

◎民主的政治不能離開民主的軍事，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民主運動中的必不可少和有決定意義的有機組成部分。當民主的政治還在地方範圍內充分實現，而沒有徹底推行於全國之前，地方性的軍事民主，地方性的人民軍隊，也就必然成為地方民主自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不僅是真正的軍隊國

家化的基礎和核心，而且也是國家民主化的重要動力與重要保障。

引經據典，說了這麼多話，其實，這些話早就被中山先生一語道破了。什麼是軍隊國家化的內容呢？「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只有反對中山先生的人才會把軍隊國家化的偉大原則轉變為實際上是掩護軍隊私人化的魔術。

二、如何軍隊國家化

軍隊國家化不僅是民主運動史上所必須通過的一個歷史問題，而且也是和當前勝利結束的反法西斯世界戰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一個現實問題；不僅是尚未民主的國家所獨有的問題，而且是那些號稱民主國家在這次戰爭中東時所廣泛碰到的問題。

在這一問題上，軍隊國家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現實問題。誰都知道，戰爭教育了人民，改變了世界；在這些改變中，最大的改變之一：由於敵人的侵略，不少戰前合法的政府不是沒落，即是流亡；不是流亡，就是在戰爭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採取若干重大的改革。從表面上看，流亡的政府和不流亡的政府之間是有着重大差別的，但實際上，戰爭在各國民主生活中所引起的重大變化，其方向是一致的。

什麼是這重大變化的因素呢？當國際國家和論陷區域裡在敵人的鐵蹄下自動起來武裝抗敵的民主力量。這些武裝的抗敵力量既在勝利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和平中也就不能不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因素。

關於這一潮流，有一位觀察家作過如下的綜合分析：

「正如前每一個國家在戰時所發生的，恐怕促使流亡領袖迅速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那有組織的抗敵武裝的政治力量。論區域的抗敵力量既組織了和敵人或傀儡政府相對立的政權，當轉移被逐出域的時候，抗敵運動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地方性——假使不是全國性的話——的政權中心。大部份解放後回來的流亡領袖在他們的國家裡所建立的不是「政治的真空」，他們發現：抗敵組織早在那裡行使政權了。

不過，無論如何，在這許多國家中繼續有斯斯拉夫的抗敵運動在實際上變成了各國所一致承認的合法政府。南斯拉夫的抗敵運動是作為對於戰前南斯拉夫的獨裁制度和外來侵略者的雙重抗議而開始的，他們有着革命性的目標，他們在他們自己從敵人手中奪得的土地上，放手實現他們的目標。當大部份國土把敵人趕出去的時候，他們已經建立起一套完全新的政治制度——包括法院，地方性和區域性的議會和地方政府——只有米洛維奇在控制下的地方沒有被這帶政治改革的狂潮所席捲。因此，當流亡政府總理羅伯西奇向蘇托建議組織一個「舉國一致政府」的時候，他不過是把那被各國所承認



的合法政府的合法地位移交那在戰爭中早已存在的事實上的政府而已。

在其他的國家，抵抗力對於解放國家新政府所產生的影響，只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抗敵運動是像希臘抗敵運動達到了那樣大的失敗的，希臘的解放路線——在去年十月轉折被選出後的時候，它已把國土到三分之二的土地——在選政府前有一個代表。……由於希臘抗敵運動被拒絕於政府之外，希臘政府局勢始終是不穩定的。

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的抗敵運動，它們的地位如像正處於那完全勝利的南斯拉夫和那完全失敗的希臘之間。因為在解放的時候，這些西歐國家中的地方抗敵運動已變正常的國家機構所代替了。

怎樣代替的？

抗敵運動的領袖們被選來參加重要的政府職位。在二月十一號組織的比利時聯合政府中，八個抗敵領袖參加了政府；而這一聯合政府的總理本身，就是一位抗敵的地下運動的領袖。

羅馬尼亞政府一共有二十一位閣員，其中十一位是抗敵組織的領袖。

荷蘭政府也於四月六日改組，包括進去了兩名抗敵領袖……中於希臘抗敵運動和臨時政府之間的合作，「改編抗敵武裝」的問題才不復出現出去年秋天那樣的重重，去年秋天比利時京華爆發了抗敵組織和國家警察的衝突，法國發生了類似的情形……（紐約，六月一號外交政策彙報）

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西方和東方的差別很大，但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是在一種什麼不同的情況下，要無視人民抗敵運動的政治力量，不管在那種程度不能成功的。即便是在某些地區反動份子有些表面上的成功，但那種成功也是暫時的局部的不穩定的。

問題的癥結在那裡？為什麼去年秋天西歐政府要解除抗敵人民的武裝發生流血而不能成功，而現在改編抗敵武裝就能和平進行，而沒發生嚴重問題？因為，儘管程度不同，聯合政府成立了，人民所要求的民主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保證了，組織抗敵武裝的辦法比較公平，比較合理了——一言以蔽之，正是因為國家有了某種程度的民主化，軍隊才能相應地進行國家化。

概括地說，作為一個從戰爭過渡到平時，所有被淪陷的民主國家所必然的遭遇的普遍問題，戰時人民抗敵部隊的正規化是在如下的條件之下和平進行的：

一、承認戰時抗敵運動的政治力量，組織反映人民意志的聯合政府。

二、接受戰時抗敵運動的民主要求，切實進行民主改革。

三、根據戰時抗敵運動的作戰功績，公平合理的整編所有抗敵部隊。

中國目前所遭遇到的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從一方面說是和上述的西歐各國相同的。因為和西歐諸國一樣，在抗戰中，敵後中國人民的抗敵力量有了空前的發展，他們實行了地方性的民主改革；他們對於抗戰勝利，在中國所貢獻的一份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現在，抗戰結束了，無論是在正面戰場作戰的部隊也好，或是敵後後方的作戰部隊也好，國家都不需要這樣大的部隊了，因此包含在正面戰場和在敵後後方的所有中國的抗敵部隊必須加以整編。但為能和平而合理地進行這一工作，我們也必須遵循着歐洲的方向，那就是：

一、成立民主的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

二、承認並繼續推廣已有地方性的民主改革（這過程包含着民主的軍方政權及其與人民相結合的軍隊）。

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整編所有抗敵部隊。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中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又和西歐諸國不同。因為，西歐諸國已經有了民主政治的「常軌」，而中國却正處於國家民主化的前夜。因此，中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就有了和四歐諸國截然不同的意義。在西歐，軍隊國家化只止於抗敵部隊的正規化；在中國，軍隊國家化的意義則是把與人民對立的部隊轉化為與人民相結合的部隊；在這裡，八年來在敵後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民軍隊本身不是國家化的對象，而是其他軍隊實行國家化的榜樣。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中國各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狀況，這種發展不均衡的形勢經過了這次抗戰而更加尖銳化了，即一方面是已經執行了民主改革的解放區，另一方面是敵偽漢奸秩序至今原封不動的地區，這兩大地區的差別是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的。這種不統一的情況固然是不合理的，但其所以不合理不是漢奸敵偽的秩序未能統一民主改革的秩序，而是漢奸敵偽的秩序還未被徹底破壞，而代之以民主改革的秩序。

怎樣才能做到真正的軍隊國家化呢？承認既成的民主改革，並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廣這種民主改革，做到真正的國家民主化。一個國家真正民主化了，真正屬於人民了，本來就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屬於國家更屬於誰呢？早已應該屬於人民的軍隊，繼續屬於個人或少數人的集團還有什麼可能呢？

# 農民在解放中

## ——解放區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

李侯森

將近一萬萬人口的解放區（編者按：目前解放區人口已達一萬萬以上了），八年來農村經濟發生了空前未有的大變化：封建半封建經濟勢力受到決定性的削弱，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已被排除，雖有戰爭的嚴重破壞和長期消耗，廣大農民階層——中農、貧農和佃農的經濟仍然向上發展。

抗戰以前的和現在大後方的農村，階級關係向兩種分化：廣大的農民都相繼破產為貧農和無產者，只有佔人口中極少數的地主、高利貸者，壟併土地，吸血而肥。資本主義性的富農經濟的發展，歷來是較困難的；現在的大後方，農民上昇為富農更加困難了。

解放區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却循着與此相反的道路：兩極（貧農和地主）縮小，中間（中農）擴大。

據手頭的北歐（晉察冀）、太行、晉綏、冀東和冀南，五個區域的可靠材料（註一），將戰前與戰後農村各階層戶口與土地百分比的平均數比較如下：

階層	地	主	富	中	貧	佃
戰前	三·六	七·二	二八·四	五四	五	
戰後	二·四	六·七	三八·〇	四七	二·五	
土地	二九·五	二二·〇	二九·五	一九	〇·八	
戰後	一三·五	一七·五	四二·五	二二·五	〇·六	

說明：其他階層如小工商業等未列入，故百分比的總和均不及一〇〇。由此可見，戰前，不及戶數百分之四的地主，約佔土地百分之三十（華北等地區土地較分散，按全國範圍的統計，地主約佔有土地一半，如按產量，因地主佔多耕地，則又將達半數），佔戶數約百分之九十的中農和貧農，所有土地不及一半（產量更少）。而現在地主戶數和土地都大大減少了，中農以下階層的土地則增至百分之六十六。兩相比較，就可看出

新社會中——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今天新民主主義社會，農村階級

結構的變遷是如何巨大！

具體說來，地主的戶數比較戰前減少約三分之一，土地減少一半；富農沒有基本的變動；中農戶數增加三分之一，土地增加五分之二以上（戰前中農增加比例最少，如按四個地區統計，則兩者增加比重更大）。貧農戶數約減少五分之一，土地約增加六分之一；佃農戶數減少一倍。上表只是一個概括性的數字，僅足表明這個變化的輪廓。其中材料又大多是一九四二年或四三年為止，現在中農的比重會更大一些。

兩種縮小，中間擴大，這就是今天解放區階級關係變化的基本規律。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談談各階層變化的具體情況，及其發生變化的原因。

「為着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在理論上是不會有人提出異議的，（國民政府土地法第一七七條明明說着：「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值得大大頌揚的便是「中國條件下，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八年來，這一主張在解放區已真正變為事實：不管程度如何，快慢如何，整個地主經濟都是在逐漸分化和回縮，農民已經從對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下面是五個地區地主的戶數與土地的下降情形（百分比）：

地區	晉	察	冀	北	歐	太	行	冀	東	冀	南			
戶數	戰前	三·八	二·四	二·八	四·五	四·六	五	戰後	二·四	一·九	二·一	二·一	三·四	六
土地	戰前	三〇·三	一六·四	三二·六	三三·四	五五·八	二六·九	戰後	九	一〇·一	一七·二	二〇·九	二〇	一五·六

晉察冀冀南等區，原來土地更集中，因之地主戶數和土地減少一半以上。其餘則均未超過一半。地主經濟下降嚴重的原因，當然是減租減息政策合理的果實的具體政策的執行。他們所獲的房租和高利貸兩次收入，

受到限制，大大減少了，一切經濟剝削也都取消了，他們不可能再將負擔轉嫁與農民了（地主在舊社會是負擔最輕的階級）。其次是戰爭原因，「掃蕩」中，敵人的直接掠奪破壞，會使地主連年的積蓄和工商業經營受到嚴重的損失，收入減少，支出增多，和敵人的破壞，戰爭的影響，又帶來第三個原因：生產消極。不少地主為了避免被租，逃避負擔，預防戰爭中的損失，就大量出賣或典與土地，聚積現款，減少目標（這採取分家的辦法）。其他尚有奢侈浪費等較次要的原因。

敵的土地政策的根本精神，是削弱封建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獲得發展，並不是馬上取消封建經濟。所以對於地主的生產經營，黨和政府會極力注意提高，如鼓勵他們投資工業和合作事業，在不影響農民的生活條件下，允許他們抽回土地剩餘積累等等。因此部分地主已自動（或被逼）轉機其生產經營方式，例如北區下降地主，一九四二年秋調查，約有百分之三轉為富農，最近兩年比例更將更大。目前解放區的中小地主參加勞動是相當普遍的情形。不少有資金的地主已轉向工商業和合作事業。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減租減息以後，地主感到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貸的利息不大，就會利用土地和資金來進行資本主義性的生產，利己已參加勞動。

富農經濟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一般說是停滯的和下降的。北嶽、太行、膠東三地區的材料，富農的戶數和土地都只有很小的下降（如北嶽的戶數四八·四五%到七·八八%，土地由二一·九三%到一九·五六%），戶數下降較大，戶數由戰前的一〇·八%減至八·八一%，土地由二四·八%減至一七·五%。引起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敵寇的破壞。富農多經營作坊與商業，他們的房屋、工具和各種積蓄被敵人焚毀掠劫，因而損傷了元氣，竟一蹶不振。如糧食下降中，由於這種原因的佔三分之一。其次因中國富農一般帶有封建成分，兼營高利貸和另租一部份土地，在減租運動中，他們一時的部份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但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的剝削和剝奪，同樣使富農體系起來。最近兩年特別是去年，由於軍事方面的勝利大生產運動的開展，雙工互助的提倡，勞動政策中偏勞的糾正，累進負擔扣除廢除，特別是吳滿有方向的統稅，富農經濟的發展便通暢起來了。北嶽早在一九四一年以後，富農經濟開始回復與上昇；戶數由四一年的七·七八%到四二年的七·八八%，土地由一九·三五%到一九·五六%。阜平胡順義村去年新增富農七戶，龍樂葛村去年新增富農五戶。而說明這一種勞比較完整的材料，

則有濱海區和另外連水區三萬四十戶的調查（註二）。

濱海區調查時間是一九四三年末，戶數由以前的五·八九%增至六·七五%，土地由一六·六九%增至一九·三三%。連東縣富農戶數由一九四二年的六·五%增至四四年的八·五%。這種還有另外的例子足以佐證，太岳陽城固隆村，四三年富農三十三戶，去年竟增至七十七戶（註三）。

中農經濟更是大覺而轉快發展着，已成為目前農村中欣欣向榮的強大的經濟力量（有不少的部份中農在向富裕中農發展，也有一小部份上昇為富農）。下面統計說明了這一事實（百分比）：

地 區	晉	綏	北	察
戶數	戰前 二五·七	戰前 三五·四二	戰前 四四·三一	戰前 二七·五
戰後	四四	四四·三一	四一·六九	四九·一四
土地	戰前 四九	戰前 四九·一四	戰前 四九·一四	戰前 四九·一四
戰後	四九	四九·一四	四九·一四	四九·一四
地 區	太 行	鹽 阜	濱 海	
戶數	戰前 三三·五	戰前 一九	戰前 二六·五六	
戰後	四八	二七·七	二七·三一	
土地	戰前 三一·四	戰前 一七·八	戰前 三〇·一八	
戰後	四七	二八·九	三七·二六	

在北嶽、太行和晉綏，中農戶數不多擁有全部耕地之半。土地比重超過於人口比重，在勞動力的佔有方面，以北嶽為例，中農擁有全部人口的四八%，僅佔勞力佔總數的二八%，佔有半數以上的膠東區和約八〇%的牛刀。

中農之向上發展，無幾地，他們的租子比過去交得少了，負擔減輕了，加以各種獎勵與幫助，於是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地高了，多開荒，多種地，多施肥，種棉，紡織，經營副業，他們的光景是越鬧越好了。（但也有極少部份的中農下降的，這主要是由於敵人破壞，勞力減少所致。）

佔過去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絕大部份租入土地的貧農是租佃關係中的主角，又是欠債最多的階層，封建的枷鎖將他們束縛最緊，貧農的戶口比重一般大於土地比重三四倍。現在他們從地主的火坑中跳出來了。貧農上昇為中農（還有極少數上昇為富農）的戶數一般佔有五分之一，但在經濟上他們都向上發展了，「翻了身了」。他們的土地大大增加了（在地主抽出土地時，許多貧農將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限食賣了去買地），人口比重以大於土

相比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了。相當大的一部份貧農在經濟上今天已接近於中農的水平。貧農這個階層無疑將一天天地縮小。

貧農獲得救濟的原因，與中農是相同的，政府對他們的照顧更多。特別在減租減稅之後，他們的勞動熱忱更加高度發揮，敵後不少勞動英雄都是從這個階層產生的。

佃農（以及手工工人）大部都上昇和經濟向上發展，一般沒有下降的。這是不詳談了。

總結以上階級關係的變化，有三種情況：第一是上昇——佃農，貧農和中農。第二是下降——地主。（富農一九四二年以前是停滯或下降，以後則開始恢復和上昇。）第三是轉變生產方式——地主及其他階層中之少數（如由從事農業轉工商業；敵人大破壞之後勞力不足將地出租，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可見佔農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如今在經濟上都獲得發展或獲得發展的充足條件了。

關於引起階級關係變化的原因，最重要的當然是減租減息政策及其他各種正確政策的執行。如果執行中發生某些偏差，則易引起暫時的不正常的變化；政策未能貫徹的地區，則變化遲緩。勞動積極，以及種棉等特產和副業經營的好，一般上昇最快，富農和中農最具備後者的條件。引起下降和阻滯上昇的最普遍的原因，就是敵人的破壞。敵人破壞掠奪糧食，必然引起急劇下降和不能迅速上昇。我們的勝利才能保護人民進行生產，改善生活。而戰爭中人力和畜力的減少（敵人捕殺搶掠、疾病死亡、和兵役等），也是直接影響各個階層經濟不能更快發展，或促使下降的普遍原因。

今後解放區農村中階級關係變化的趨勢，無疑將是上述規律的繼續；地主經濟日漸削弱，他們將逐漸改變經營方式；富農經濟會有通暢的發展；中農經濟更加澎漲，優勢日增；貧農繼續上昇，大量湧入中農隊伍。

解放區執行了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其他各種正確的財經政策與社會政策，於免債大農民從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獲得解放，積極抗敵，從事生產建設和其他各種建設，使抗戰勝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成為可能。地主雖然暫時受了些「損失」，但大敵當前，不動員農民抗日，要自己說理生存也成問題，特別是敵佔區地主普遍破產的事實擺在面前，繼續這道一般地主都有認識，許多開明的地主士紳已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我們今天一方面削弱地主的封建剝削，但同時又保證交租交息，以調節階級矛盾；而更重要的是，乃在照顧地主階級的將來，這就是改造他們的經濟生活，幫助他們向資

本主義轉化。

減租減息政策的徹底執行，能達到土地改革的目的，這已為今天將近一萬萬人口的解放區的實際所證明。毛澤東同志已向全國宣佈，「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敵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行減租減息，然後採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抗戰勝利之後，新民主主義政策如能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至少在已建立的廣大區域，在黨的現行許多正確政策繼續之下，中農貧農以及富農的經濟，自會得到更暢快的發展，特別是出於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無疑將為我們帶來一個新式的繁榮而富足的農村。

（註一）本文材料全屬解放區的零散區。北撤材料包括十三個縣、三十個村，係北撤區黨委作的調查，時間一九四二年秋。太行材料包括寧國區二十多個縣，一百五十多個村，係太行區黨委作的調查，時間大都在一九四二年和四三年，其中敵前數字為二二縣一五九村的統計，敵後數字為一六縣一四八村的統計。晉級材料包括與縣二個村區縣三個村等，晉級分局所作調查，時間一九四四年六月。遼東材料見四月九日本報附錄漢文。濱海材料包括莒南、濰縣三個區六個村，係山東分局所作調查，時間一九四三年末。

（註二）見附錄漢文。

（註三）太岳區黨委行署主任報告見三月三十日本報。

整風文獻

解放出版社 二五〇元

諷歌劇初集

周而復等著 二〇〇元

此係訂正本，內收整風運動風潮文獻，反對黨八股，「農村調查」序言，改造我們的學習，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文件，凡二十七種。

新華日報圖書課經售

# 論愛國

巴甫洛夫斯基作  
李少石譯

少石同志是前日報編輯兼十八集團黨部辦事處秘書，非九號，在本月八日午後由沙坪壩返城時中途被槍擊中彈，因傷重不治逝世。少石同志不幸遇難是中國革命事業一個很大的損失。少石同志是一個不聲不響的忠實的共產黨員，他早年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民國廿二年因此入獄，監獄五年，堅貞不拔。抗戰軍興，少石出獄，時健康雖已大受損害，但仍以如火之熱情，繼續從事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少石同志的工作範圍是多方面的，他的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用英文翻譯不少中國新文藝作品，介紹國外作品給中國讀者，這是他幾年來會開斷絕的繁雜工作之一。這種的「論愛國」是他在遇難前幾天譯好的。少石同志死了，但少石同志幾十年如一日所不聲不響地從事的事業，一定會在千百萬中國人民繼續不斷的努力之下開花結果的。我們不忍不將他的心願，我們只能用加倍的努力工作來紀念他。他替我們翻譯了「論愛國」，他自己不也是一位光輝的愛國者嗎？除掉「愛國」還有什麼更確實的名詞來形容他的事業呢？

——編者

## 歷史的試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若干國家發生的愛國運動，是一個異常廣泛的運動，包括工人、農民、智識份子，和他們的社會組織。但本文祇論及這個運動中的一個單位，即關於工人階級的前衛，特別關於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自的從很久以來，他們的愛國心，是被懷疑的，在某些地方，現在還是反對派攻擊的目標。

批評工人階級運動的反對者的思想武器中，最常用的一種——坦白地說，是最危險的武器——就是這樣一種論說：共產主義者和一切左翼的工作者一般地都是不愛國的。甚至在蘇維埃國家建立了後，共產主義者已實際上證明其熱烈的自衛性的愛國心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以及和他們合作的社會黨人，還繼續被人指為「他們國家內部的敵人」，而共產主義的思想，則被指為與愛國主義對立的東西。隨着法西斯運動在許多國家中的

滋長，這個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對工人階級運動的進步男女動的反動的迫害，就日益厲害，日益以更惡毒的形式出現。不單是法西斯，而且一切法西斯的德意志們——極端主義者和專制主義者——都說，共產黨人和許多社會黨人對國防的態度，最低限度，是可笑的。

但對於共產黨人和他們的批評者的愛國心的歷史試驗，不久就到來了。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奴役妥協和平的民族於掠奪戰爭，這使社會各階層，各政黨，不能不以行動來證明誰準備保衛國，誰準備賣國。這個最高的火的試驗揭開了什麼東西呢？

第一，在歐洲被德國佔領的國家中，出賣自己國家的，却並非是在戰前甚至在戰爭爆發時自稱為「愛國」，而實質共產黨人為「不可靠」的，法西斯黨人和其他極端反動份子。出賣法蘭西的，就是共產黨的叛徒的敵人——貝當、賴伐爾，達朗和他們的同僚，後台老板，佛耶（Olivier Lyautey），施乃德瓦爾德（Schnitzler）及其他大公司，托拉斯的財閥們。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的賣國賊是些什麼人呢？誰幫助了德國人



，把斯拉夫的民族保加利亞——給的人民對俄國幫助他們解放是深深感戴的——變成了德國反蘇的軍事基地？誰在波蘭、捷克、奧地利、南斯拉夫、希臘、芬蘭的屠夫奴役者們賣過氣力？可鄙的吉斯林，貪婪的銀行家和大地主們支持了德國人。當戰爭初期，德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暫時地得到勝利時，那些甘心為了一頓肉羹而出賣其祖國的反動分子，在淪陷的國家中，就一天多起來。

第二，共產黨人和許多社會黨人，在保衛他們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反抗德國帝國主義者及其同謀犯的蠶食中，實際地證明了他們百折不撓的忠誠。無論任何地方，他們都是愛國份子的先鋒——反對德國侵略者暴行的工人羣民的先鋒。

愛好自由的民族，對蘇聯英勇的士兵和游擊隊的愛國行為，對南斯拉夫、法國、波蘭、希臘及其他被德國人暫時佔領的國家中的英勇的愛國者，無不表示羨慕，并以此為值得驕傲的事。但我們知道，這些將來要記載在歷史上，作為愛國英雄主義和忠誠的無上榜樣的行為，有許多是共產黨人和其最接近的戰鬥同志做出來的。

這些不可爭辯的事實，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邪惡的敵人提出的公案，給予那樣的打擊，人們難以為他們應該聰明些，不再提出誰愛國誰不愛國的問題來了。但是，他們中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對經濟學，獲得自已是已被擊敗了的。比如，在美國，英國，和瑞典，就有一些舊日的反共大亨們，利用被壓迫的人民反共偏見的頑固性，仍在企圖與波作浪，散播懷疑的種子。因此值得我們檢討一下仍然藏在他們武庫裏的似是而非的論點。

### 愛國和戰爭

某些勞動人民的敵人提出如下的爭論：不錯，聯合國內的共產黨對反希特勒的戰爭，是採取了愛國的立場，但還不過是偶然的罷了，因為共產主義的思想，并不保證他的信徒們在任何戰爭中都擁護他們的國家，因而，在另一戰爭中，他們也可以採取非愛國的立場。

這是一個由正確的前提作出來的不正確的推論。當然，共產主義者并不準備擁護任何戰爭，而祇擁護正義的戰爭，解放的戰爭。但也祇有那些戰爭才是愛國戰爭。侵略的戰爭，並沒有什麼愛國的意義在內，不管他們怎樣把它畫上光榮的色彩。而且，某一國的罪惡的統治者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是一

種暴行，不單對別個國家的生命不利，而且有損自己國家的生命和榮譽。因此，假如反動的新統治者要把他們的國家投入於非正義的戰爭，侵略的戰爭中時，真正的愛國主義要求該國的人民，不單絕對不去支持那戰爭，而且甚至要反對那戰爭。

不必從這地方去找例子，也用不着討論德國的事情，因為這子也該知道，假如德國人民的大部份能够稍稍注意於他們自己國家的命運，他們早就已起來，反對希特勒政府和他的可惡的帝國主義的冒險了。現在且談談德國帝國主義者從前的衛星——羅馬尼亞，芬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罷。二十多年來，這些國家行政和司法當局，就把共產黨人和與共產黨合作的工人團體的會員，當成是「叛徒」，要受長期的監禁。這事是很有意義的。當戰爭爆發時，安東尼諾斯古，李蒂，荷殺，費洛夫之流，打開城門引進德軍，使他們的國家和希特勒站在同一戰線的時候，那些對國家忠心耿耿的羅馬尼亞人，芬蘭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的愛國任務是什麼呢？自然，是不去支持法西斯戰爭，而且反對法西斯戰爭；因為和希特勒德國站在一邊來戰爭，必然要損害到這些國家的重要利益，戰爭勝利，損害愈大，因為德國勝利了，他們的獨立就完了。

這些國家的親希特勒的統治者們所做的事情，無疑的是要建立德國對全歐的牽制，他們這樣子做，就把他們的國家帶到毀滅的邊緣。但是，這些一再出賣其國家的帝國主義的工具們，却隱藏他們的罪惡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而同時把那些為要從德國暴政及法西斯戰爭的破壞下解救出來，而自我犧牲地戰鬥的共產黨員及其他的真正愛國者，送上絞刑架或送入牢獄中去受審刑。

因此，歷史的試驗證明了共產主義的立場，是一貫的，積極的，忠誠的愛國主義的立場。

### 沒有民族的偏見

某些勞動人民的敵人，把愛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混淆起來，說共產黨人和一切誠實的民主戰士對於愛國是半條心的，因為他們沒有把自己民族的放在其他一切民族之上。這話是幼稚的民族偏見和帝國主義的偏見。一種似是而非的偏見，而把兩者恰和真正的愛國主義相反。

我們知道，民族或種族偏見，即認自己的民族或種族是最優秀的，比其



他一切民族或種族爲優，這種觀念，很久以來就爲反動份子所培植，目的是要在反民主運動的鬥爭中，爭取政治落後的羣衆。反動份子，經常煽起對別個民族或種族的仇恨和離異，把民族的偏見，變成侵略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體系，於是以前那些方法如誘惑猶太人，私刑地毒害黑人或攻擊阿拉伯人，來證明其民族的「優秀」。但當這些起來作愛國的戰鬥，以保衛他們的國家，使不受外人侵略的時候，這同一的侵略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便和敵人緩和——如在歐洲的侵略國家——或者，如美國或英國或法國或法蘭西的份子，起來破壞對敵的共同戰鬥，幫助敵人使他不至完全失敗，以求達到對敵人妥協。

這些民族主義者和侵略主義者喜歡引用一句格言：「我的國家，對也好，錯也好」。顯然的，他們以爲對他們的政府的政策，作僞爲愛國的支持，就可以使每一個侵略別國的生命和自由的行動，變成有理。這自然是對愛國觀念的一個明顯的曲解，是沒有歷史的或政治的根據的。

歷史上沒有一個愛國運動，是以損害別國平等自由爲目的的。十八十九世紀所有大的愛國運動，目的都在解放自己國家，使不依靠外國或擊退外國的進攻，例如一七七五——一八二二年的美國獨立戰爭，一七九二——一八九四年的法國人民的革命戰爭，一八二一——一八九九年的希臘民族解放鬥爭，一八三〇——一八四六，和一八六三年的波蘭解放鬥爭等等。

很明顯的，願意爲自己國家的自由而戰鬥是一回事，願意爲壓抑別國的自由而戰鬥又是一回事，前者是愛國，後者則否。例如，統治殖民地，和保存帝國主義壓迫別殖民地人民的特權，這些都不能藉口愛國而認爲正當。據我看來，殖民地的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政策，並不是爲國內羣衆的人民謀利益，而只爲一定的上層階級謀利益，這些階級，因剝削殖民地而得到物質的手段，又用這物質手段，來加強他們對殖民地及對本國的控制。他們階級採取一種狹隘的自私政策，以別國爲犧牲。那樣的政策在國際關係上散播不和，把災難帶到各民族去。

甚至溫和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也把自己民族的利益（或其上層階級的利益）和別個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反之，甚至是最熱烈的愛國主義，也尊重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相信各民族的不平等。偉大的俄國民主政論家，甚至在前一世紀就在黨報和書報提出愛國思想的這一方面。杜布諾波夫說：「真正的愛國主義對其他民族的仇恨是不相容的。」柏林斯基則熱誠地宣稱：「愛自己的國家，就是說熱烈地希望人類類的理想，在這國家內得以實現，并盡自己的可能，來推廣這個目的。否則愛國主義就變成野蠻主義，後者愛自己的東西，祇因爲它是自己的東西，憤憤一夢外國事，祇因爲它是外國事物，對自己的醜惡，也無愛不止。」

因此，真正的愛國主義是和民族自大，自私，對別個愛好和平民族的仇恨，全無關係的。

勞動人民的敵人常常否認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信徒可以是有愛國者，因爲，他們說，這些人是主張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的。我們的反對者把作世界主義，就是說不替自己國家或維護自己國家的意思。

### 勞動階級意識中是沒有世界主義的

這是完全的謬誤，共產主義和世界主義沒有什麼相同之處。雖然是在勞動人民國際團結的旗幟下戰鬥，共產主義運動在每一國家——作爲工人階級運動的先鋒——都是深深植根於其本國的泥土中的。共產主義並沒有把真正的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立起來，反之，它把它們結合起來了。祇有懶惰和頭腦糊塗的人，工人運動的敵人，才敢說工人階級不能一方面愛自己的國家，同時又爲和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兄弟般的鬥爭而奮鬥。祇有說謊者和誹謗者才敢說，工人階級，在爲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而奮鬥時，就已不再是愛國的，而成爲世界主義的，與他們自己的國家民族絕緣。這

一工人階級可與自己國家絕緣或拋棄自己國家的說法，本身就非常荒謬。因爲近代的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肢體，不祇爲了它的數量，而且爲了它在政治上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個國家的將來，主要地決定在工人階級的身上。因爲工人階級與國家的關係如此密切，作爲工人階級政策的共產黨是不會拋棄它的國家的，除非它要拋棄它自己的所有的重要的民主權利和自由。

工人階級的意識中，是沒有世界主義的。世界主義祇是國際大銀行，國際加進商，大股票投機家，國際軍火大王（即「販死的商人」）的代表們代理人所特有的東西。這些紳士們才是真正信從「國家是在自己邊境的地方」那句拉丁的諺語。他們中間許多人說，他們并不忠於某一政治主張。他們喜歡說「我們是商人，超越於政治的」。但他們的所謂超越政治，是不能照面值接受的。不錯，他們真的是商人，買賣是等於他們生命的一切。但這并不能阻止他們憎恨人民的每一次民主運動，或阻止他們不去用法西斯或親法西斯牌子的政治代理人，去打擊民主運動。

而且，正是因爲他們對金錢的狂熱的崇拜，這些國際的投機家，不祇願賣出他們的貨物，而且商機願意把自己也出賣於出價最高的外國帝國主義

者。各國專家學家。其本意是在中立國的。而且是在法國和蘇聯多數黨派  
國家的。——他將繼續德國法西斯主義者服務的。經過他們的加送爾或其他和  
德國人的協定，他將直接間接地加強希特勒德國的軍事力量。作了貢獻，  
而且在此戰爭中，有許多人為德意志主義的利益，在自己的國家內，編造戰  
時生產。在美國，以杜魯門（現在為美國總統）為首的委員會，曾舉出若  
干和德國專利公司有關係的美國大專利公司的非愛國的活動。其他國家亦舉  
了類似的事實。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國際間斷者和投機家的世界主義并非「超政治  
」的。反之，他是反民主親法西斯政策，與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政策  
有密切關係，如不遏止，他一定產生新的戰爭的危險。

和這個國際掠奪的致命政策相反，和變時主義法西斯主義相反，聰明的  
工作者宣揚國際友好國際團結的政策，從工人組織行動的團結開始，歸結於  
一切民主國家的密切合作，以及反對法西斯主義，保障各國的和平，自由與獨  
立。這一政治路線不是和各個民族的愛國情緒完全符合麼？讓工人階級的反  
對者試來證明，比方說，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倫敦開會之世界職工大會的決議  
是：一切民主國家的民族利益不相容的。讓他們去說服人民，使他們相信  
，民主國家親新合作來消滅法西斯主義，保障各愛好自由的民族的自由與安  
全，不是各民主國家自由發展與繁榮的最佳保證。人民是不會相信這個的

但這正是我愛國和國際合作聯系起來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共產黨人和  
一般進步的工農階級份子所主張的。

### 和蘇聯協調

最後，人們懷疑進步工人的愛國主義，理由是他們是和蘇聯一致的。  
譬如，他們會提出這樣的狡猾的問題：「不否認他們是一個外邦的忠實朋友  
的人，怎能叫作愛國者呢？」

是的，沒有一個國家的聰明的工人，或進步的農民，或智識份子會否認  
他同蘇聯的親善的。但是這和協調，不是任何國家的真正愛國者的關係  
來的。這種關係符合麼？這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協調，安說，而社會主義國  
家是通過勞動者進行工作的，它尊重，維護民族平等對民族自決的原則，并且  
是尊重和平的。——的保證和國際的繁榮。偉大的蘇聯國家的崇高的奉獻

與作用，現在已為愛好自由的國家的廣大人士所認識，所允許。祇有蘇聯  
的親法份子，才繼續辯論蘇聯。

一切反希特勒的國家都承認他們的利益，是和蘇聯長期合作以維持持久  
和平與友好和平國家的安全，不可分割的。那麼，各國的真正愛國者，必須  
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和密切合作，最能保證他們國家的安全。又有什麼可怪  
？很明顯的，這一信念，是今天愛國主義的自然結論。

另一方面，同樣明顯的，反蘇的意向，是和愛國的信念不相容的。自然，  
有人會企圖以偽愛國主義來粉飾他們每一反蘇的政策。但過去幾十年的歷史  
，已會一再指出，這樣的粉飾，不久終於會脫落的。在此次歐戰的前夜波蘭  
爭中間，這表現得特別明顯，例如，德國的附庸國的統治者們曾極力企圖以  
偽裝的愛國主義來粉飾他們的可恥的反蘇政策，但不久這種偽裝便破裂了  
。現在大家都明白，安東尼奧斯古，里蒂，荷根和費洛夫等所進行的是反愛國  
的戰爭政策，大有害於他們的國家。今天，在這些國家中，誰敢出來指責那  
些反蘇的假愛國的口號，誰就會變成人民眼中與蘇聯的對象。現在波蘭還有誰  
相信皮爾蘇斯基，貝克和他們的同謀犯們的反蘇親希特勒政策，是以愛國為  
目的的呢？

法國和英國的某些黑派的「愛國主義」的命運，也同樣的可憐。這些人  
違背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頑固地拒絕成立反德聯合戰線，企圖使蘇聯孤立，  
讓希特勒在東面行動自由。甚至在英法已對德宣戰後，法國的維希政府就  
府和英國的張伯倫政府，還對反蘇陰謀，比對保衛自己的國家更感興趣，  
首先是以政治軍事上的援助，給予反動的芬蘭，芬蘭那時已成爲進攻蘇聯的基  
地，後來更變成德國的附庸國。

假如某些英國法蘭西的定期刊物，不惡意地提起戰爭初期的事情。並說共  
產黨的愛國心，我們也無須回過頭一切。這些煽動家大聲疾呼：「不要忘記  
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蘇聯和美國還未對德宣戰的危險時期，那時我們  
的共產主義者并不支持他們的國家進行戰爭」。但假如必須回過頭中的這  
一段，我們何不也回過一下，在戰爭開始的八個月中，法國和英國政府曾  
並沒有對德宣戰，并未作任何軍事行動，甚至并未有採取嚴厲的步驟，不  
強迫他們的國家的防務力量。反之，法國政府那時正從事在安地治法共產黨人，  
并聯同英國的張伯倫政府供給武器與正在和蘇聯作戰的芬蘭反動份子（意大  
利的墨索利尼政府也同樣做）。而且，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六日的英法蘇聯軍  
事會議上，（即蘇聯參戰後入法國及蘇聯對德宣戰前的一個月）蘇聯參戰

魯賓伯倫說不久將派遣一個法國師團一個波蘭師團到芬蘭去。

因此很明顯的，法國英國政府那陣還未弄清誰是他們的主要敵人。自然，這樣的戰爭，并不是打算要喚起法國英國真正愛國的人們的欽羨的。但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當諸建設第再次的戰爭遭到了失敗的時候，法國的愛國者，首先是共產黨人，並沒有投降，而且開始進行他們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長期英勇鬥爭。

一九四〇年五月，當在張伯倫內閣中擔任次要職位的，著名反對慕尼黑政策的邱吉爾，出來領導政府的時候，英國政策才開始好轉。但是邱吉爾也只好把苦澀地帶地帶英國政府帶入反希特勒鬥爭的新路線。他在國會裡，主要還須依從前資助張伯倫和慕尼黑政策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而在英法外交政策多年的不幸的經驗之後，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反希特勒的人們，還在某時間內採取觀望的態度，甚至在邱吉爾政府之下，也是如此，直至那政府以自己的行動充分證明英國已實地奉行新的路線。關於這方面，最重要的，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邱吉爾的宣言——說明英國支持蘇聯的解放戰爭的——和以後的英蘇締結共同行動的協定。這之後，英國就沒有有一個正統的工人不持懷疑的態度。工人階級都充滿了愛國的熱誠。共產黨人尤其活動，堅決支持他們國家反希特勒的戰爭。

這就是戰事初期，英國形勢的真相。換使共產黨人確實犯過某些錯誤——如在英蘇兩國戰事爆發後都曾聯名行動的問題上，這是他們曾被批評的主要問題——但是證明能真正維護英國人民國家利益的，還是他們——共產黨人——而不是批評共產黨的人，與蘇聯同心協力，不祇不會妨礙英國工人階級的愛國情緒，反而激起了這種情緒的增長。這可以由英蘇軍事合作後，英國工人階級在歷史上第一次充滿了熱心勞動的精神的事實得到證明。

同樣地在其他國家，工人和蘇聯的協同，也激起了他們的愛國熱誠。這些事實，業已為法、南、捷、波、保及其他國家的公正觀察者所證實。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有政治覺悟的工人中，愛國情緒的發展，是在蘇聯埃愛國主義發生的那一天真正開始的。

當俄國的工人變成了他們國家的主人以後，其他國家的覺悟的工人自然而然地對我們蘇聯埃愛國主義感到一種深切的愛，而開始把它作世界工人的組織。他們對我們國家的愛，同時又引起了對他們自己國家更深刻的愛，因為是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國家，是他們自己光明的未來的所在地。

在蘇聯埃愛國主義更廣利各國工人心中，則產生出更廣更深刻的愛國主義。

其力量之大，在他們進行的反對德國侵略者的遊擊戰爭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德國的侵略者想永久奪去工人的國家和工人對國家的權利。

## 愛國與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烈的愛國主義在許多資產階級國家中重新生長，蓬勃起來。對德戰爭勝利後，它自然不會停止，而且必繼續生長。

從歷史根源上說，愛國運動是和年青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運動相聯繫的。百五十年前，法國愛國者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到十九世紀的下半，愛國主義才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失去其革命的民主精神，而被統治階級改變為一種虛偽品，用來欺騙羣衆。今天在資本主義中，真正的愛國主義，是依賴着而且發展了過去一世紀的偉大愛國運動的優良傳統的。它把反對外來壓迫者鬥爭中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和政治上強烈的民主和進步的趨向結合起來。它從對自由的愛好中，從反對封建專制權利，反對階級壓迫，和反對社會寄生份子處於工人的階級的剝削的鬥爭中，取得其動力。

今天，當法西斯是世界各地民族自由的主要敵人的時候，沒有真正的愛國主義不帶上明顯的反對法西斯反對奴役的性質。以愛國主義為名的反法西斯的鬥爭者，是一種特別危險的偽愛國者，因為他們要阻止那主要的愛國任務的完成；即：根除法西斯主義和奴役的任何遺毒。

在今天再生的愛國主義，並不是一種無聊的儀式，而是一種為我們人民的自由和快樂的將來而奮鬥的鬥爭。在若干暫時為德國佔領的國家中，我們曾見到軍民壯烈鬥爭的例子，參加鬥爭不祇是工人，而且有些早就表現了沒有任何能力或意志去為推進社會的理想而進行真正戰鬥的份子。許多由民衆和分子出身的游擊戰士，青年的農民，和工人并肩作戰，證明了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能够接受高尚的理想和理想，並且如必要，能够為那理想，犧牲生命。

當然，共產黨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愛國運動的先鋒。因為共產黨主義的鬥爭以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理想，來激發及組織它的信徒，這是其他主義所沒有的。今天，共產主義是前進工人和知識份子間，他們的日常生活，對英勇的過去的回憶，對美麗的未來的憧憬，這一切的聯繫物。無黨派

(下轉第七〇九頁)

# 戰後時期美孤立、帝國主義的威脅

W. 福斯特作  
蘆 蕪 譯

德國的軍事失敗，今天已是既成事實，日本最後被擊敗的日子也因此而更近了；同時，這也是全世界反動力量紛紜性的失敗。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並不止於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為爭奪世界的權衡而進行殘酷的賭博，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任何地方，一些有力的，有法西斯思想的資本家，企圖建立一個世界法西斯體系這種企圖，也是法西斯的威脅。世界決不能忘記那些在法國、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裡的大資本家們，他們曾經積極支持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發展，他們希望希特勒與德蘇聯，同時造成法西斯主義的世界安全——在這一世界裡，資本主義的剝削者們不願被罷工主義，議會民主和軍火日益接近社會主義的傾向所阻礙。

在目前偉大的民主的人民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進程中，法西斯國家德、日、意竭力爭取法西斯主義統治世界的事業，曾經得到民主國家與反動資本家們的幫助。德日意三國如今在軍事上大部分是垮台了。但如想得出結論說：由於聯合國軍事勝利，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會自動地結束，那就錯了。

這種結論就意味：假使今天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裡反動力量接近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世界資本主義是窮了，病得厲害；兩次世界戰爭和大的經濟恐慌，都在一代中發生，就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制度是窮了現實的和潛在的矛盾；在生產能力和市場之間，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在殖民地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在大資本主義國家自身相互之間，都有矛盾；這上面還必須加上世界反動份子的惡毒的反蘇運動。這些傷傷的反動份子們，繼續企圖通過他們的走向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的計劃，循着希特勒所走過的道路，來解決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

這種威脅不能不用軍事手段就可以擊退的。要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矛盾，繼續去毀滅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的源泉，就必須在軍事上擊敗德國與日本之外，努力採取整齊的政治經濟的辦法，這種辦法已經由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在克里米亞會議所採取的綱領，明確的規定下來或清楚地預見到

了。

現在，法西斯世界正在被聯合國國家的武力擊碎了，想消除殘存的建設法西斯世界的大陰謀，從而剷除法西斯主義的真正的基礎，就不僅是進行清場而已。還需要許多重要的工作。許許多多強有力的法西斯團體和傾向，多半正在至少採用着一些辦法，要使法西斯主義在軍事失敗後還能在下去，要把嚴重的阻礙，給與戰爭中所產生的新的民主主義的政府和綱領。

在解除了的國家向以前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裡，大多數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們，那些法西斯主義真正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不等地，幾乎在全歐洲，並沒有作爲真正的戰爭罪犯而懲治。因此，在戰後時期，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哺育力量必須被強有力的民主政府，強大約勞工運動間有效的政治和經濟的手段所控制。

在以前的軸心國家及其衛星國裡，被擊潰了的法西斯黨徒，軍隊和其他的反動黨集團體，也會有一些亡命的殘餘份子。這些，必須要給以毫無慈悲的清算。

至少在最近一段時間裡，像佛朗哥西班牙以及葡萄牙，也還是法西斯主義的毒害中心。這些中心必須被他們的人民，在聯合國國家積極的幫助之下，予以消掃。

也還會有強有力的法西斯第五縱隊在阿根廷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存在，這對於西半球和世界的民主，是很大的威脅，必須予以擊破。

也還得對付梵蒂岡的親法西斯政策。在整個戰爭中，這種親法西斯政策曾經是一種有力的威脅，在戰後階段必須確定的予以反對。

但最有力的反動威脅的中心，是存在於美國國內，隨着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垮台，在美國的反動份子們將負起在美國國內發展世界的反動中心的任務。這種反動核心，就是由胡佛、霍登堡、杜威、威爾遜、惠勒、威爾遜、上、斯密士、甘納特、林白、麥考米克、杜邦、萊德、高富林等

新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份子。

### 美孤立、帝國主義者的反動

決不是所有的美國資本家都贊成侵略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他們之中很多人追隨着一般的羅斯福路線。在這些較有遠見的資本家中間，如開塞爾、克魯格、納爾遜等人明白他們的階級利益是和國家利益相符合的，他們明瞭在世界範圍內，美國採取單獨行動的任何企圖，結果必然是確切無疑的災禍，因此，他們接受德黑蘭和雅爾達所規定的一般政策。

資本家：比較好戰的帝國主義的份子，雖有着龐大的力量，國內的報紙大部份是在他們的手裡，在國會裡也有強有力的議員，他們相信，無論如何現在的世界局勢，對於美國要獲得世界的霸權提供了一個空前的機會。他們不惜任何代價以獲得世界霸權。這些反動份子們看到：在一方面，從前組成新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日本和意大利是毀滅了，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甚至英國，因為戰爭，也大大地削弱了；同時，在另外一方面，美國，受戰爭的損傷很輕微，這就成爲在工業上，金融上同軍事上無可比擬的強國了。因此，他們是決心把他們的力量，用在帝國主義世界統治上面。

胡佛、范登堡、赫斯特這些帝國主義份子，對於資本家對帝國主義之憤慨，沒有詳細地說明出他們爭執的宏大計劃。這在幾年前的，亨利·魯斯和他的「美國世紀」的理論，正是這些人的心跡的最清楚的說明，但是，一般說來好戰的帝國主義者是不贊成這樣坦白的，因為這樣會使他們成爲民主力量十分顯明的敵人。然而，他們的政綱的頑固的帝國主義性，在集中與總着德黑蘭和克里米亞重大決定的當前問題的立場上，能够清楚的看到。

這些帝國主義份子們看來，在他們的帝國主義征服道路的最障礙，就是蘇聯。他們認爲美國與蘇聯不能像朋友樣，遵循着克里米亞的路線在和平時期也如戰時一樣地共同工作，它們不是朋友，而是仇敵。他們的方針是要把美國造成主宰。他們對蘇聯懷有憤恨，因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今更添上了新仇——在他們看來，蘇聯是封鎖了他們的法西斯帝國主義道路的重要力量。

在當前戰爭中間，這些反動份子的態度是：設法使作戰努力的重担加在

蘇聯身上，盡力和希特勒單獨的談判和平，企圖在解放國家保持反動政府當權；懸掛拒絕無條件投降的口號，而造成一個對蘇聯的寬大的和平；陰謀保護戰爭罪犯等等。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帝國主義陰謀。

關於聯合國的問題，他們的態度是陰謀使美國在新的和平條約中成爲主要操縱者。他們努力造成三強之間的分歧；他們努力用轉移聯合國安全會議的大部份權力給聯合國大會的辦法，來削弱聯合國安全會議，在大會裡面，由於拉丁美洲國家的大集團的幫助，他們希望控制主要的投票權；他們用培植各種反蘇的偽造的民族要求，希望這樣來使新心世界機構在漫長的狀態之中。

對於英國，他們的妄自尊大是很少掩飾的。他們貪婪的將目光投到英國的統治地上面，特別是澳洲、新西蘭和加拿大。對於拉丁美洲，他們是滿懷着輕蔑，而且認爲在我們南方所有的國家，實質上是美國的附庸。他們對於中國的觀念，以爲中國是美國的剝削者的一片寶貴的礦藏。他們希望美國的空軍和海軍基地遍佈全世界，而且，他們希望在戰後階段保持我國的軍事力量到一種過高的水平——顯然地，這是爲了最後的反對蘇聯的戰爭。

他們對於蘇聯的態度，是一種極度的敵對態度。他們把美蘇之間每一點分歧挑成爲危機，（如像關於波蘭他們所會經作的那樣），而且他們要無恥的在美國人民的耳朵前，喧嚷着「種有害的觀念」，那就說對蘇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態度，范登堡在聯合國舊金山會議上表現得特別清楚。因此，美國的代表團，追隨了范登堡的領導，厚顏的拒絕了蘇聯關於民主的波蘭政府與會的提議。對於允許波蘭阿根廷的代表加入聯合國，他們應當贊成，這種允許是對抗着蘇聯和其他國家強烈的反對的。爲帝國主義世界反蘇陣線奠定一塊基石，這是胡佛、范登堡這些反動份子們處心積慮的企圖。全部的事件都嚴重地削弱了美國的民主的威望。

胡佛、范登堡、赫斯特、范登堡這些帝國主義份子的國際經濟政策，是緊密地和他們的軍事和政治的政策相結合的。在戰後階段，他們希望完全自由自在地搶奪市場，他們相信，美國因爲有優越的工業資源，能超越其所有商業競爭者。因而，他們是羅斯福國際經濟政策頭腦的敵人；羅斯福的政策最適合於克里米亞的協議的，而按照布里斯森林建議案所發展了的，爲了經濟的重建，這些協議就召低率的關稅和國際合作。這種狂熱的帝國主義份子看來，所有這些計劃，祇不過是一些「胡說八道」而已。

胡佛之流帝國主義份子的國家政策和經濟政策，自然十足的適合於他們



使能去其外交政策。他們應當對羅斯福政府採取敵對，而現在又企圖使羅斯福政府成爲廢物；他們從不放過一個破壞國家團結的機會；他們在原則上反對充分生產與充分就業；他們唾棄故羅斯福總統新的經濟人權宣言，和他們的六千萬人就業的綱領，說實際上那是社會主義；他們不斷地呼喊着「自由企業」，這就是說：他們要放手槍，大體上如使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去進行大的限制。他們努力創製勞工運動；他們加倍的努力來運籌和控制政府。在勞工運動方面，他們的傀儡們——烏爾、路易士、漢特遜、杜賓斯基等等——的活動完全適合於這些反對派們底帝國主義綱領的。

### 必須防備的危險

美帝國主義的擴張計劃，是海軍大和獨有方的力量作後盾的，這種計劃之法西斯主義性質和相殺的戰爭威脅，特別是在戰後時期裡，應該是很明顯的。如果假定這種計劃真的實行起來，能夠免除不幸的後果而能得到別的任何東西，這種假定都是荒謬的。英國同其他的資本主義強國將抵抗美國的統治。大不列顛已經因爲美國的壓力和帝國主義野心而感到大大的煩惱了；假如胡佛和塔夫脫之流能夠引誘或者強迫美國政府採用他們的政策，結果，只龍是和英國發生大的衝突。如果想像強大的蘇聯也會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命令，這也是荒謬的。同樣地，如果企圖實行毫無限制的，國際經濟競爭的胡佛帝國主義政策，一定會產生一種空前世界的危機。

美帝國主義積極的擴張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將和仍舊遠爲強大的集合體的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以及和強大的勞工運動，和美洲其他的民主力量發生衝突。這是到達國內和國際的災害的寬泛而直接的道路。胡佛式的帝國主義將造成戰後世界主要的反動危機。要認清胡佛之流的聲浪者如果得行其志，將會引到極端情況；我們就必須考慮，如果在去年秋天由於索以死屍而失敗了的杜威，勝利地獲選爲總統的話，世界在現在是會處於怎樣的悲慘的境地。

胡佛、杜威、范登堡這些帝國主義份子，現在正積極的組織他們的力量，企圖在一九四六年舉行國會選舉中，爭取聯邦政府權力的制衡。他們在最近兩週去，遭受過很多嚴重的失敗，這些失敗包括有杜威的失敗，德黑蘭和克里米亞會議的成功，蘇聯乘機孤立主義，日益成長的國家的對蘇的友誼，歐

工運戰的政治覺悟等等，雖然如此，他們仍然是強太而危險的。從此即休知歐米判斷這些人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特別是從重大的戰鬥，像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大選時所進行的戰鬥來判斷，如果過低的估計他們，這會是愚蠢的。他們是必須由反法西斯聯盟堅決地進行戰鬥的一種威脅，特別是在我們想起一九四六年的選舉，和我們進入復員階段，而對着很多重大問題的時機。

歐洲的戰事的結束現已來到了，根據戰時動員局長艾森豪的聲明，戰事的結束將帶來戰時生產的減縮，這種減縮很快就會到達百分之三十之多；雖然地，在這種局勢下，除非是採取了適當的防止辦法，這是更大的經濟危機。羅斯福政府製訂了很多計劃，這些計劃包括布里斯敦計劃，低率關稅的提議，六千萬人的就業計劃等等；但是國會反對派的壓力下拖延了很長的時間，而沒有甚麼建樹。這種拒絕採取適當迅速的手段，就會招致在戰後時期的經濟上的大破壞。

這樣的一種經濟破壞，固然地，是胡佛之流的帝國主義份子所希望的。他們的企圖推測，是建築在戰後的結束後經濟混亂的前途上的。他們希望經濟的經濟危機，將會幫助他們成爲像「我早就告訴過你這樣子」的先知者似的反對派，來使得他們的黨徒在一九四六年被選進議會去，而一般地，這會助長他們創製勞工運動的破壞把戲。這將會推翻羅斯福的全部計劃。這將挑動起尖銳的國內階級鬥爭，放燻下新的戰爭的基石，如像當時他們所說的好的一出路那樣；這將會再度增強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目前國會內外的反對派們，對於現在建立對內和對外的政策的政策，其包括的嚴重危險就是如此。

### 當前的鬥爭

美國正因爲它是這樣的強大，而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地又是那樣脆弱，爲了完成克羅斯米亞會議的目標，担負着極大的責任。在更進一步的從軍事戰爭一方面說來，這是實在的，特別是在經濟的戰場上更是實在的。但個國家爲了自已和世界的利益，必須表現出民主的經濟領導，否則克羅斯米亞的和平、民主和繁榮的計劃，就不能實現了。美國現在正處於着它歷史上中間地位大的世界責任。

美國在今天世界事務中是極重要的地位，使侵略的帝國主義傾向在我們





#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M. 格略塞爾作  
葆 荃 譯

下面的這篇文章，是從格略塞爾的一本論馬恩列斯如何學習與寫作的書中譯出來的（原書名「論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研究與寫作的方  
法」）。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告訴了我們馬克思研究各種科學，閱讀書籍及學習外國語文的情形。馬克思把研究工作和學習外國語文，都  
視為是生活鬥爭的一種武器，並且他的一切研究工作並不是脫離現實，而是由革命鬥爭的實際要求來決定的，這種精神，很值得我們在學  
習時作為借鏡之用。

——譯者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在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的時候，曾經這樣講起馬克思：

「假如你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馬克思的學說能夠抓住最革命階級中的千百萬人的心呢？那麼你們就只能得到一個回答：這因為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所獲得的各種知識的堅固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之後，就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共產主義；而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根據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所作出的最精確的、最詳細和最深入的研究，再弄了他完全把握住以前科學所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證明出這一點。」

「凡是人類社會所創製的一切，他無批判地加以改造過，一絲一毫都沒有放鬆過」（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六頁）。馬克思一生都在學習。當他讀完了大學和得到博士學位時，他又重新研究科學，而同時還從事大規模的革命宣傳、鼓動與編輯的工作。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工作，時時刻刻都是因革命鬥爭的要求而決定的。馬克思本人在他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論」一書的序文中，曾經這樣描寫了他這個時期的科學研究工作的情形：

「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當我任「萊茵新聞」的編輯時，我最初才碰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害關係的問題發表意見的困難情況。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伐和土地所有權再加劃分的問題的討論，當時萊茵省省長馮·夏培爾先生關於摩索爾農民情況的問題對「萊茵報」所作的官方的論戰，最後，還有關於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討論，都給了我對於經濟問題的初步的動盪。從另一方面講，當「向前邁進」的善良願望正好多倍地趨於專門學識之上的時候，在「萊茵新聞」上就可以聽到一種帶着輕微的哲學色彩的法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反響。我自己發表了反對這種種愛好的意見，但同時在和「奧格斯堡德意志報」的論戰中，我又坦白地承認了我當時的知識，還不容許我對這些法國思潮的內容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十二卷第一分冊第五——六頁）。

馬克思的這段故事，告訴我們他善於正確而又

時地認識他自己知識上的缺點，並且絲毫不羞於承認這個缺點，他對於任何一個問題，假如他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時，他決不冒險地「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而立刻就進而作更詳細的研究。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也曾向青年團員們講起這一點，警告他們要反對理論研究上的膚淺的毛病。他這樣講道：「假如我曉得我知道的事情很少，那我就想辦法多知道一點」（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七頁）。

馬克思為了要充實他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時所感覺到的那種知識上的不足，他是從不惜勞苦去加以研究的。」

一八四三年的秋天，恩格斯這樣寫道：「馬克思懷着狂熱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和法國史。這個研究的結果，就是他自己本人轉向社會主義。」（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十六卷第二分冊第二五六頁）。

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他所製定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上，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馬克思一直到死的一天，都沒有中止他對經濟問題的研究。他所遺留下來的原稿、抄本，編輯

總之，以及他在批判地整理他所研究的各種問題時所表現的靈敏，都給予我們一種可能足以說明這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天才與創造者的創造工作的實際經驗中，抽取其精華與實質的經驗。

爲了專攻馬克思所遺留的種種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刻認識，不啻需要具有巨大的智力，同時還需要對於科學與生活的一切部門有極巨大的知識。而馬克思本人就是完全掌握這些知識的。

保羅·拉法格(註)這樣寫道：

「馬克思的頭腦，是用歷史與自然科學部門中的以及哲學理論中的多得難以盡述中的事實來武裝起來的，他並且善於卓越地利用他在長期思想勞動中所聚集起來的全部知識與觀察。」(見「馬克思遺集」抄文本一九四〇年第一卷第五二頁)。

馬克思對於知識地從過去的科學中，提取出科學在人類知識的各種不同部門中所提供給他的一切東西，凡是他們爲了這個目的所需要的「生產工具」，他都用他自己的手來爲自己鑄造出來。

馬克思用最精細的方法，時常多次返覆地來研究這一本書或另一本書，他不僅研究了在他以前所出版的全部科學的、歷史的與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他還研究了技術史、實用經濟、各國工業與農業的情況，統計學，甚至還研究意大利的複式簿記。他的記憶力是異常驚人的。他從年青的時候起，就學會了牢固地發展自己的記憶力；他按照嚴格的方法，學習用他不熟悉的語言來背誦詩歌。雖然這樣，他並不單靠他自己的記憶力，他還時常在他自己的抄本中，用極其簡潔而有力的筆記，將各種實際資料，他有一種時常重讀自己的筆記，並將他所聚集起來的材料再加以系統化的習慣。

馬克思的抄本和極其簡潔的筆記，他是以看出，他運用了多麼大的注意力於獲得正確的知識。他特別研究過高等數學、物理學、化學、研究過自然科學，甚至還研究過生理學和解剖學。舉如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就說了這樣的話：

「在這個完全不能工作的時期當中(馬克思這個時期正患流行性感冒——原作者註)，我讀了加木特的生理學，格爾德爾的同一著作，克里謝爾關於組織學的學說，希普茲漢的組織與神經系統的解剖學，希萬和希萊姆的細胞學說……在最近這個時期，我想多多地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除此之外，我還準備去聽當福有實物解剖和解剖的課程」(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三卷第一九三頁)。

當一八六三年正月間，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時，他曾到地質學學院聽過庫里斯教授的實用工藝學教程；研究過地租的問題，研究過土壤化學。馬克思不斷地工作着，他常以休息的形式，從這一個對象轉移到另一個對象，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多樣化。閱讀文藝作品，閱讀莎士比亞、海涅、巴爾扎克以及其他他所喜歡的作家及詩人的作品，這對於他就是休息。

拉法格寫道：

「除開讀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之外，馬克思還有一個特色的休息方法。這就是讀歌德，他對於歌德的作品有極特別的興趣。……(見「馬克思遺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〇頁)。

當他的妻子生病的時候，他無法擺脫他經常的研究工作，「就寫成了一篇關於無政府黨人的論文，據許多看見過這篇文字的數學專家們的批評，它

極其有條理的，極其優美的。……(見「馬克思遺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〇頁)。

至於馬克思怎樣組織他自己的工作和怎樣處理書籍的情形，拉法格曾經這樣告訴我們：

「馬克思從不讓任何人整理，其實那更正確一些，是弄亂了他的書籍和紙張。它對具有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極其混亂的；其每一件東西都放在它一定的位置上，他并不放尋我，很快地就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書籍或是抄本。甚至在講話的時候，他也時常會停下來，找出書中的一段引用的文字或數字給你看。他和他自己的工作室合而爲一個整體，在他的工作室裏的書籍和紙張，就像是他身體的四肢一樣地服從他的意志。

「在排列書籍的時候，馬克思並不滿意於外表的整齊，各種開本的書和小冊子都一本一本本地堆排在一起，他不是按照它們的開本，而是按照它們的內容來排列的。對於他，書籍是智力勞動的工具而不是奢侈的裝飾品。『它們是我的奴隸，它們應該按照我的要求而爲我服務』……他在書本上劃線的辦法，使得他很容易找到書中所需要的地方」(見前書第八八頁)。

馬克思特別重視做摘要的工作。認爲是極重要的他所讀過的材料的工作的過程，我們從這樣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他甚至還爲他自己個人的圖書館編有目錄提要。但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滿足於單純的閱讀和爲書本做摘要的工作。他批判地採取了它們的內容，檢查了書本中所引用的事實，給它們以最嚴格的分析，有時爲了證實某點那

價而研究了堆積如山的統計資料。馬克思從不利用任何沒有經過查證的統計來源。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他是不利用間接得來的資料的，而永遠在努力尋求直接的資料來源；他甚至從「直接的資料來源」來檢查這些材料，並以此為標準，不惜多到大英圖書館的書館去走一趟。在研究每一個對象和現象時，馬克思總要研究它的歷史來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很明顯地，就是每一個研究的對象，都引起了他的許多新的問題。正如他在寫作「資本論」第三卷中論地租一部分時，他特別研究了原始社會史、農事、俄國和美國的土地關係，地質學以及其許多問題。為了能更好地研究俄國的土地關係，他還化了很多的時間專門認真地學習俄文。

為了遵守他自己和恩格斯的根據直接資料來研究問題的方法，馬克思特別學習和把握他在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外國語言，好用這國文字的原來閱讀資料的原文。馬克思能閱讀歐洲各國文字的原稿，並能隨意地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寫文章。除此之外，他還學了古斯拉夫文、俄國文和塞爾維亞文。馬克思非常重視學習外國語言。恩格斯·拉薩爾的說法，他喜歡重複這樣一句話：「外國語言是生計鬥爭中的一種武器」。我們從他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寫給他父親的信中」可以看出，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已經不只是單純地，換句話說，就是按文法的方法學習英語兩種語言，他還把很多東西從外國文譯成德文。從外國文翻譯，這是不習外國文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列寧後來也曾說過。

馬克思努力學習外國文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在一八七七年馬克思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他曾這樣說過：

「為了她具有我對現代俄國經濟發展的了解的可能，我學習了俄國語言……；此後好多年當中，又研究了和這問題有關的許多官方及其他出版物」（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五卷第三七六頁）。

在馬克思的抄本中，到現在還保留有許多筆記，足以證明他是用了怎樣的頑強和勤敏的精神來研究俄國語言。他記下了每個生字的意義、格的變化和動詞變化表，填化了很長的力氣於把俄國文字的特點，如動詞的各種形式和格的語尾等等。他第一本作為學習之用而寫的書，就是德蘭的「車廠和放逐生活」（見赫氏著的「邁夫和恩格斯的回憶錄」）。在他開始學習俄文的六個月之後，他已經能夠閱讀原本的俄國文藝作品，他讀了普希金、果戈理和沙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著作，再過了六個月，他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寫信告訴齊非里德·邁耶爾，說他已能非常流利地閱讀俄文了。」

下面就是從這封信中引出的幾句話：  
「我不知道當否告訴你，我在一八七〇年初，就開始學習俄文，現在我能非常流利地閱讀這國文字。這是我因為有人從彼得堡寄來了一本弗萊利希所著的非常有趣的「論俄國工人階級」（特別對農民）狀況」的著作而引起的，同時我也能閱讀謝爾斯謝夫斯基的優越的經濟論著（他曾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七年之久）。在這種樣的年紀，要能把握一種和古典的，日耳曼系與羅馬系的語言截然不同的文字，這是要化很大的氣力的。現在俄國的思想運動，證明出了一件事，就是民心的激動不安是越來越深了。思想時時刻刻都是用許多看不見的線和人民的身體聯繫着的……」（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六卷第八七—八八頁）。

（註）拉薩爾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又是馬克思的女婿，其所寫的「邁夫和恩格斯的回憶錄」，是了解馬克思生活的最好文字，中文有趙冬垠的譯本，學術出版社版。

（上接七〇二頁）

米對共產黨給予那樣有力的支持和信任，如我們今天在法國，南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甚至意大利、芬蘭、羅馬尼亞所見到的。

在蘇聯——勝利的工人階級的偉大的國家——愛國主義自然達到更高度的發展。

蘇維埃愛國主義是為列寧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偉大主張，和布爾什維克蘇維埃政府對這些主張的成功的事實應用，所強有力激發着的。蘇聯各民族文化的加速度的進展，把他們組織為一家——為相互友愛的牢不可破的繁榮繁榮東鄰。

以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斯大林憲法，不僅是蘇聯政治制度的鞏固的基礎，而且是蘇維埃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同時，如在這個全世界唯一徹底的民主憲法採用時斯大林所預見的，它為其國家正在進行反法西斯野蠻主義戰鬥的人們的精神的後盾和真誠的支持力量。

人與人間割裂的廢除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共國的歷史的成就，不斷地刺激着幾千萬勞動人民的愛國主義的生長。結果是：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蘇聯人民獲得絕空前的試驗。蘇聯愛國主義已證明為一不可擊敗的力量。沒有人會懷疑，在我們目前已經進入的和平建設的新時代中，它將作出新的奇跡。

在國外，每一個國家的愛國運動無疑地將繼續為消滅法西斯反動，國家民主化，及保障安全與獨立而戰鬥。各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真正愛國主義，都準備着抵抗一切帝國主義的野心，繼續着在正義與和平合作的基礎上爭取國際間的關係。真正的愛國者將支持一切維護民主自由的鬥爭，及為勞動羣衆生存的合乎人道的條件而戰鬥。

（譯自「新時代」六月號）

# 論科學的預見 (中)

華西星也夫作  
凱 豐 譯

大家都知道，科學泰斗列寧偉大的發現，在一九一五年，根據詳細的分析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條件——發現社會主義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可能勝利。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勝利。根據科學的分析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許多事實，列寧勇敢地拋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帝國主義時代以前所規定的、舊的、過時的論點，即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可能勝利的論點，並發現了新的規律。下面就是列寧著名的定義：在選定定義中給予天才的發現，即是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勝利的預見：

「政治的和經濟的發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定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於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勝利是可能的。」(註二七)

歷史由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光輝證實了列寧的這種預見。列寧是理論思想和革命實踐的巨人。不是屈服於馬克思主義的字句之下，而是勇敢的反對第二國際，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敵人，首先是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中，明白而確切的規定了新的理論——即是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勝利。如果列寧不這樣做，那麼當時黨、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黨就會迷於黑暗中，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會開始衰落，無產階級就會失敗，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勝利。」

列寧的科學預見是歷史事實，他的預見的天才能力，能夠熟視歷史事實的過程，預見未來的自發運動，組織它並引導它到勝利的道路上去，從表現他這種天才能力的許多著名的例子中，就是在十月革命前夜，列寧對俄國狀況的分析。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九月所寫的「隨頭的災難及怎樣與之鬥爭」一文中，他給這個環境以明白的估計。

在聯本國內，列寧描寫在這個時期內俄國和勞動羣衆所處的那種可怕的

情景(飢荒，交通的破壞，資本家的怠工等等)，列寧指出了消滅這種隨頭災難的整個計劃。列寧對於找出災難的條件，給了一個科學的、理由充分的分析。他指出這種出路物質條件，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條件成熟了。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因為戰爭本身的本質產生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經濟上沒有成熟，任何起義也不能造成社會主義)而且因為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善的物質的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門，是歷史階梯的這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與社會主義的階段之間，任何其他過渡階段都是沒有的。」(註二八)

在這種分析之後，列寧作出結論，作出指示，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怎樣做，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怎樣做：爲着挽救革命，爲着挽救國家，應當與資本家破裂。消滅資本主義。

「只有勇敢徹底的與資本主義破裂，在對外和對內的政策上才能挽救我們的革命，才能挽救東轉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國家。」(註二九)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否則就是人類的死亡。如果人類想得救，它就應當把自己的命運委託於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以使整個人類過渡到共產主義去。

「戰爭造成了這樣無窮的危機，使得人民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這樣緊張，給了整個現代社會組織這一種打擊，使得人類在兩者之間選擇：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把自己的命運委託於最革命的階級，以便以最迅速的、最急進的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法上去。」(註三〇)

列寧這些預見，光輝的證實了。列寧在「隨頭的災難和怎樣與之鬥爭」一文內所指出的辦法由勝利的無產階級——蘇維埃政權所實現了。我們的國家把自己的命運委託於英勇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它把我們的國家引導到共產主義的光明的自由王國。

真正是在起義的前夜(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列寧寫給黨中央的一封信。在這信內列寧說：



「我寫這封信是在二十四日的晚上（十月）。無論如何要在今天晚上，今夜趕速捕獲臨時政府，解除軍官團的武裝（如果反抗，就戰勝它）。不能等待，等待會喪失一切！」

「歷史不要求革命者遲緩，他們今天能夠勝利（大約今天將勝利），明天來冒險要喪失許多，要喪失一切。」（註三一）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勝利了，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奪取了政權。列寧和斯大林所領導的革命凱旋了，勝利了，執行了列寧的計劃。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四年在克里姆林宮軍事學校晚會上的演詞中，對十月革命前的環境給了一個很明白的估計，它的複雜性，列寧預見的力量，以及這種以空前的真確性實現了，斯大林同志說：

「在這樣的時候舉行起義，這是什麼意思呢？在這樣的環境裡舉行起義，這就是孤注一擲。可是，列寧並沒有怕去冒險，因為他知道了，明眼看到了，起義是不可避免的，起義是會勝利的，俄國的起義會造成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俄國的起義會幫助西方的痛苦的事業，俄國的起義會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起義結果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共和國將成爲全世界革命的堡壘。」

「大家都知道，列寧的這個革命的預見，後來已經毫不差錯的實現了！」（註三二）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理論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特別複雜的環境中他沒有感到驚慌，而與斯大林一道給了一個武裝的起義的計劃，列寧向全世界證明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偉大和力量，他經常指出在達到預定的目的中不要有任何一點驚慌。要堅定、勇敢、果斷。

列寧說一說列寧的下列的有名的預言。

「在我們第八次大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鄉村工作的報告，他說：『我們預言明天能給十萬架頭等的耕犁，供給它汽油，供給它架駛員。』（註三三）

「我們預言，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我們的農村已有七萬二千架耕犁，共有一百萬匹馬力，我們的農村的農民大批的將加入集體農場。在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已組織了八萬六千個集體農場，有六百萬農戶加入集體農場。」

直接與列寧的這個預言相關的，就是在一九二二年在「糧食稅」一本書內，他說出了另一個預見：

「十年——二十年與農民有正確的關係，就在全世界範圍內保證了勝利（即使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形下）；否則，就要忍受二十年到四十年白晝的恐怖。」（註三四）

列寧這詳細的預言的估計了事實，在這種情形下，甚至與所發生的時間也相符合。這後來的事實看得很明顯。在十三年後，即到一九三四年，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大會上說：

「……勞動農民，我們蘇聯的農民，最後的和一往不復返地站到社會主義的紅旗下了。」

在一九三三年，在蘇聯農業中已有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個有組織的集體農場，包括蘇聯農民經濟百分之六五。

列寧關於革命階級的作用，關於必須經常估計社會主義各階級的階級反抗，這種預見也是很有名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與英美芬蘭」一書內，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整個的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沒有終結時——判斷必然還希望有條件，而這種希望便變爲實際的嘗試。在第一次嚴重的失敗之後，曾推翻了他們——他們不會到工人階級，他們不相信這事，沒有想到這事——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他們的心起而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失去的天堂，謀他們的家庭的破產和窮困（或五弄到從事「下賤的」勞動……）。而判斷者資本家階級，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緊跟着。幾十年來各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猶豫不決和搖搖不定的，今天跟隨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而破產，因工人的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經顛倒，東奔西竄，痛苦流涕，在兩個陣營間跑來跑去。」

列寧的這個預言的預見同樣也爲此活——證實了。工人階級的敵人，在資本家和地主起，到托洛茨基派和哈林派被粉碎，不——一次的全國蘇維埃會議制度——資本主義，這就向我顯明了關於列寧的預言的正確性，關於列寧的洞察力力量。

在一九二〇年，在共產黨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列寧報告全世界一切共產黨員：







# 拉鐵摩爾論如何解決亞洲問題

## ——推荐拉氏新著：「亞洲的決策」——

D·華 思

編者按：拉氏新著「亞洲的決策」一書中譯本，即將由中外出版社出版，我們對拉氏一書中的論點雖不能完全同意，但在大體上，這是一本好書，是值得向中國讀者們再三推荐的。本文作者是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名詞評家，去年曾來重慶，他對中國和亞洲問題有很深刻的了解。

——編者

在目前大多數對遠東時事寫作的美國人中，沒有一個人能比拉鐵摩爾的話更值得傾聽的。他一身兼附歷史家、記者、編輯、歷史家，及美國副總統和蔣委員長的事務顧問，他對於政事及其理論也同樣精通。出版他著作的出版商說他的新書「亞洲的決策」一將對於戰爭及和平有直接影響，因為他的書會被全世界外交家拜讀的。這話是非常對的。因為「亞洲的決策」是他的鉅著之一，顯然他在現時代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這本書定有幾似乎近誇大，但實際上確未有自滿之處，這是讀者所應加以原有而亦為我們所應加以最大讚揚之處。這是因為拉鐵摩爾先生並未提供了任何容易治癒的高國藥方。不過他這本最近的著作確實對於美國了解遠東問題之嚴重與具有世界重要性一方面，有極大之貢獻。這本書思慮非常沉靜，內容非常引人入勝，非常激動而充滿卓識與學問，又有普遍的開揚性。因此，它必然是對於美國大眾意見之啓發，有極大的幫助。這對於於大眾意見的啟發，如其美國領袖在戰後聰明地表現其本身任務的話，是非常必要的。

假如在拉鐵摩爾先生所必須貢獻的關於遠東問題的卓識之中有一個中心點的話，那就是：東方實在是全世界民主的一個試金石，——包括東西兩方面。四方帝國主義時代已經在珍珠港事變，新加坡及香港之陷落而終止了——

這至少是日本所造成的——自此以後，在東方各國將來的勢力上競爭，大體份將是在觀念領域內的競爭。倘若美國的民主觀念及理想並不能給予東方已覺醒的各民族以一個更好而更充實的生活，倘若英國人及荷蘭人並不對於這種覺醒的含義加以承認的話，在東方，蘇聯民主思想要求之實現一定會愈來愈大，而是在這條路上——不是經由戲劇性的叛亂——蘇聯的權力將在東方各領域內趨於顯著。

拉鐵摩爾先生說：「俄國人」及「蘇維埃聯邦」對於所有這些東方已覺醒的民族，具有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在他們眼裡看來——在老一輩人看來這是疑惑不定，在年青一輩人看來則更為清楚——蘇聯變成國際上的安全，經濟的繁榮，技術上的進步，神妙的神業，自由教育，機會均等，及民主——這是一一個最有力的綜合物。蘇聯也贊成民主，這一事實是不容忽視的。它贊成民主，因為它贊成所有其他的東西。在美國，我們常有對於外國要求實行民主之精神出以狹隘目光之習慣。倘若中國或蘇聯或某些其他異邦民族不照美國自己將益格魯克邁民主主義標準去辦，我們就說他們是不民主的。倘若我們仍舊守舊習慣的話，我們將始終是捕風捉影，而不能在政治中有所決策。

拉鐵摩爾先生相信，東方將有一顆鑽石，不僅因為民主在「吸引力」的政治「樹」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也因為我們在亞洲的工作將對於我們在國內所做的有莫大關係。正如拉鐵摩爾先生所說：「我們一定要愛我們的經驗，所尚不能完全給予我們的一個教訓：內外政策密切的交互作用。我們不能對於遠東——或歐洲有一個坦坦白公正而民主的外交政策，而在國內却進行一個反動的政策，這正如我們不能夠生存在半奴隸半自由的狀態上一樣。威爾遜「天下一家」的概念在「亞洲的決策」裡得到一個深刻的再確認。

東方在美國人面前固然可以代表一個民主的試驗石，但它對於它自己也是一個試驗石，所以在這一點上中國民主的前途也成爲非常重要的了。倘若中國——一個爲了爭取並維持自己獨立而戰鬥，因而獲得承認爲世界上四強之一的東方國家——沒有能力使它自己成爲一個民主的國家，那將給予整個遠東方面的民主思想一個打擊，而使那些在世界上看不到一個機會以影響民主的反動勢力感到滿足。

因爲拉鐵摩爾是中國問題權威，他對於中國方面的寫作當然特別對人入神，他過去因羅斯福總統的推舉而爲蔣委員長的政治顧問。

關於共產黨三制之實行，使共產黨員在各種委員會及地方行政團體和延安區內較高級會議內，不超過總額三分之一人數一事，他說道證明了共產黨已脫離了水陸是一個小反對黨的階段而達到了一個在聯合政府內有良好要求權的黨派地位。所以他不應被斥爲一個輕易被共產黨宣傳所中的人。事實上，拉鐵摩爾仍繼續對蔣委員長表示崇高的欽仰，而於敘述一九二七年革命左右兩翼之分裂時，對於蔣委員長特別有袒。因此他對於中國共產黨之最後判斷與一九四四年夏訪問延安的所有美國記者具有同樣好感是很有趣味，值得注意的事。

現在讓我們從拉鐵摩爾這本書裡再引一段對於中國將來有極重要關係的話：

「當日本人押逼出中國時，其逼出或逼使日本人之軍隊的政治糾紛將是一極端重要的事情……倘若政府實施的政策並非自由政治組織及自由政治代表，或時是僅不能代表大多數的一個聯合政策，那就要發生非常可怕的覺醒與政治的不安。由此觀之，中國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已爲地主統治的趨勢所動，因爲地主的利益在中國論階級解放以爲一定原理於壓迫農民之一途，那決不讓他們有政治上的發言權，相反地，共產黨聯合政策的趨勢已使中國論階級的農民在一個壓迫地位上廣泛地處於抗日聯合政府。在迫擊日寇

時，共產黨的軍隊與中央軍並肩奮鬥進入收復地帶。

凡讀過林語堂關於一九四一年中央軍與第四軍衝突中他認爲是共產黨卑鄙險惡陰謀的各種描繪的人，大概會驚歎這新四軍即確包含有共產黨份子及一共產黨副軍長，但本身並非一個共產黨軍隊。拉鐵摩爾說，在以上這極端險惡的陰謀中，他認爲組織優良，而在其種種陰謀之中心，決不站在地主利益方面，因爲在日本最後征服之後，地主階級將，農民的組織已異常堅強，地主無以控制。因此國民黨這新四軍可以攻擊。」

對於日本的計劃，拉鐵摩爾把支持天演或依賴於自由主義之日本商人將是空想的利益與無補之談完全打破，但對於教育一般日本人民之可能却給予甚高希望。他舉出許多證據日本人的祖先即是日本人而現在經過良好教育以後變成很好的國民的例子。對於我這些勇敢的日本種的突圍人，他的引導是一個很好的讚美，而他對也確是值得讚美的。在他對於荷蘭人在東印度統治的批評，我認爲他確爲失諸交臂一些。無論如何，在這本書所有的批評裡，我們不能不稱「亞洲的決策」爲一本極有價值的好書。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共和)

# 毛澤東同志三大著作

論聯合政府

二〇〇元

新民主主義論

一〇〇元

農村調查

一〇〇元

新華日報圖書課經售



#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

回到軍區政治部不到一個星期，敵人對晉察冀力量。

的秋季「掃蕩」開始了。敵後較大的掃蕩有這樣一個規律：總是夏季麥子實時，和秋季秋收快收割時。根據，一方面敵人實行軍事計劃，解決敵區的糧食恐慌，一方面同時也增加了解放區的糧食恐慌。

軍事鬥爭不是為了完成政治鬥爭的任務，就是為了完成經濟鬥爭的任務。

往年敵人的「掃蕩」常常是先「掃蕩」一個解放區，然後把「掃蕩」這一個解放區經驗用別個解放區去。這次却不同了，敵人向華北華中各個解放區同時進行，而這次動員的兵力又較往年為大，單是對晉察冀北線區就動員了四萬餘兵力，二六，六三，和一一〇等三個師團大部主力，獨立混成旅，該團與六十二師團的半數主力，獨一獨二兩混成旅團的一部，加上偽治安軍六個團的主力，和三十餘縣的保安隊。此外，還動員了全部的漢奸偽組織，如「財共委員會」，如偽「合作社」，集體整訂了掠奪計劃，企圖一鼓而摧毀解放區的經濟和軍事

敵人的「掃蕩」和軍區的反「掃蕩」，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是敵我實力的總考驗。

在反「掃蕩」開始時，我隨着軍區司令部行動，不久，由於軍區的主力是在第一軍分區，而第一軍分區的主力部隊是三三兩團，我於是到了三團的團部。三團是隨着總司令部一團行動的，我有機會經常和軍區保持了聯繫，這樣，我比較容易了解整個反「掃蕩」的過程。

軍區部隊的裝備我是知道的：砲很少，大半是繳獲敵人的，經常用的是迫擊砲；主要的武器是輕機槍和步槍，而這些又非常不一致的，從國幣來說，有捷克式，有日本三八式，……從國內出品來說，有漢陽造，有太原造，有中正式，有土槍……子彈也是不充裕的。從軍事準備上看八路軍，的確是很落後的。但如果從指戰員的質量上來說，不僅在全國是第一流的，就是對敵寇來說，也是比較

優越的，特別是在政治質量這一方面，更是不可以相比的。

然而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絕不僅止於此。當我開始跟隨八路軍向這樣頑強的敵人進行反「掃蕩」的時候，在我的腦際浮起了一個問題：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呢？

老實說，開始，我對反「掃蕩」的信心是不高的。經過整整三個月的反「掃蕩」，事實給我一個完滿的答覆。這三個月的反「掃蕩」，大致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人分進合擊，連連解放區中心地區，然後太倉分放兵力，進行所謂有重點的反「掃蕩」，搜捕破壞；軍區部隊則針對敵人的分散「清剿」，實行集中兵力予以打擊，敵人因此不得不集中兵力來對付，這就粉碎了敵人初步的計劃。第二階段，敵人紛紛在掠奪津滬兩河的產糧區，軍區部隊就紛紛為戰場，分散兵力，配合民兵，積極打擊敵人，奪回被搶糧子；同時發動廣泛的聚糧收，於是敵人的計劃歸於烏有。第三階段是，敵人以主力奔集合擊軍區部隊機關學校，只有極少數的機關，因為警覺性不強，而遭到部分損失，其餘進犯的敵人都遭受到了八路軍嚴重的回擊，把敵寇打出解放區，勝利地結束了三個月的

反「掃蕩」的勝利，是軍事鬥爭和各方面鬥爭

密切結合的成果。

首先是軍事鬥爭與人民的結合。

敵人的八路軍之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主要的因為這支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它是為人民的，故人民也不惜一切來擁護軍隊。在解放區的人民，從小孩子到老頭都組織起來。反「掃蕩」一開始，人民第一件工作，便是堅壁清野，把所有能搬走的東西，像衣服、糧食、傢俱、日用品，……都搬到村外山上山下的暗窖里，地洞里。解放區的人民，即在平時，也早就有了暗窖地洞的準備，有些地方只留下一些必要用的東西在家里，一有情況，就趕着牲畜，帶着一切東西上山了，留下給敵人的是空無一物的門堵牆壁。這還不算，敵人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實行之下，人民又有了「狗不認家，把能拆下的窗戶木門都拆下，另外用土填把窗戶和木門都堵死，這樣，敵人既進不了屋，也不易拆房子了。

敵人所到的地方，處處感覺困難，沒有糧食，沒有糧食，沒有用具，他連找一口鍋做飯也不容易；更糟糕的是失去了耳目，地方上沒有羣衆，敵人從那里了解八路軍的行蹤呢？而八路軍到一地方，那地方民兵哨見，不一會，什麼都有了。我會經常有這種經驗，一次我隨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彭德懷在反「掃蕩」中，走到阜平縣董家村，村里開了一人，這一頓飯一口鍋也找不到，糧食更不必說了，連司令部帶的糧食也吃光了。我心里想，堅壁清野對敵人固然好，但是不要使自取滅亡也沒有損壞了。但不到半小時，山上的人聽說八路軍在此

宿營，繼續回來了，一小時之後，連個司令員都吃清噴香的小米飯了。在各個頂敵堡的民兵的哨，當時一一向我們報告敵人的行蹤。

此外，在反「掃蕩」中，人民還幫助軍隊送飯、帶路、慰問、抬傷員、送茶、送飯……必要時，就揮舞着槍和擲彈的個個戰鬥員。這次反「掃蕩」，黃昏村老鄉搬運了一個八路軍的傷員，是發熱病的，敵人從軍中中心地區搬運，路過此處，兩個治安軍要將病員帶走去領路，老鄉不肯，被偽軍打得死去活來，結果把病員搶走了。他醒來後，連忙把發熱的自己的大兒子叫回來，追上偽軍，央求敵人，換回了八路軍病員，說他這個兒子地頭熟，好帶路。實際上他兒子在半路上撒謊，敵人不注意時，就逃回來了。人民還保護自己的軍隊，請問：敵人有什麼辦法不敗呢？

其次是八路軍主力和民兵的結合。

在晉察冀解放區，民兵的組織是普遍到每一個山溝村莊。男自衛隊，女自衛隊，是每一個村莊都有的羣衆武裝組織，它的核心是基幹自衛隊，而基幹自衛隊的核心是游擊小組。在這次反「掃蕩」戰役中，單是民兵和敵人就進行了二十一次大戰，戰鬥了四、四、四八個地方。這些戰鬥都直接配合了主力作戰，阻擊和粉碎了敵人的作戰計劃。民兵顯名思義是羣衆性的，敵人一進入解放區，除遇到八路軍的主力打擊外，還到處遇到各地民兵的打擊。如九月十四日行唐縣以北蔡園和莊莊兩處的五百多敵人，想合擊劉家莊，馬北村、康家莊等七個村莊的民兵，在二區民兵大隊部指揮下，他們在連環約二十多里的山嶺上，用土槍、地雷、手榴彈，把敵人的五百多敵人擊傷了，敵軍送糧

糧食的武器，就是這樣滾上過幾軍學校訓練的民兵，和敵人打了一天，這一天，敵人只走了十二里路，合縱的計劃粉碎了。八路軍的主力因此就非常有利地打擊進犯的敵人。

不妨再舉另一個例子。九月二十日，敵人經過正平縣二區何家窪時，民兵中隊長何玉林，帶了二十一個民兵，依據有利地形設伏。黃昏時分，敵人進入了伏擊圈，民兵先以猛烈的手榴彈投向敵人，旋即扔出飛雷九個，繼之又扔出大石頭打擊敵人，用了這樣簡單的武器，一共打死了三十八個敵人，打傷九個敵人，還奪得大量贓利品，民兵卻沒有一個傷亡。

民兵在反「掃蕩」中，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是主要的任務之一。在敵人所到之處，凡是能通汽車的一切公路，那附近的民兵就有組織地分批去破壞，同時埋地雷使得敵人汽車不通，運輸線斷了，重者能通，但到處佈佈有地雷，又彷彿沒有地雷，這得有工兵在前面探路，有時要起雷，有時要修路，使得汽車一天行進的速度慢到這樣一個可怕的程度：只走二三十里地，還沒有有人走的快。

敵人的通訊聯絡也不斷受到民兵的破壞，敵人在解放區臨時建立起來的通訊網，到處受到破壞。早平的一個民兵，把敵人無線電報回來了，要屬的是四莊一個民兵，他割電線割到敵人電話線的實外，還不甘心，公然伸手進去拿一二人的電話機。這雖出於小心的動作，處處被發現。電線割斷了，人要派人出來修，修的人遭到民兵的伏擊，很少能回來的，於是這條線的人也不敢出來了。

最後敵人頭痛的，是地雷。爆炸運動在晉察冀是普遍展開了。地雷多到這樣一個程度：即連八路軍，沒有當地民兵帶路，也不敢隨便走一步。即前





地方才發覺，日本憲兵和軍官長把車停開，大車搜查，以為車上有八路了，這後聞得敵偽非常恐慌，一直傳到偽滿北新社會上去，在宣傳會議上敵偽都認爲這是一件大事。

政治交鋒普遍展開，敵偽軍和偽組織人員都動搖了，有的逃跑，有的反正，有的自殺，甚至有的把炮都擡走了。在敵偽壓榨下的村莊因此得以解放，人民起來反抗敵偽的勒索和奴役。在這樣政勢之下，大大影響了進入解放區的敵偽軍，使解放區中心地區的八路軍更加有利地粉碎敵人的「掃蕩」計劃。

第五是八路軍本身的戰鬥力量。

縱然是四萬裝備優良的敵人，但是一進入解放區，就腹背受敵，處處遭到困難，行動固然要受到交通的阻礙和民兵的伏擊，宿營時也要遭到地雷和民兵的襲擾，糧食用品都不易找到，逼得敵人每次「掃蕩」不得不帶了一長列的牲口和民夫，來運糧給養和彈藥，這個運輸隊像一個個的生長在脆弱精幹的隊伍上，大大妨礙了敵人的行動。最糟糕的是：敵人所到之處，沒有一個不受到一個既堅又強的人在解放區裏走路，八路軍一行動，敵人是很難了解情況的。這些不利條件，反過來，都是八路軍的有利條件，在羣衆的海洋裏，八路軍自然就像生龍活虎一般的了。

敵人是頑強的，但八路軍更頑強，從政治質量上說，就是十個敵人也比不上一個八路軍。每一個八路軍都是有了思想覺悟了的戰士，他知道爲什麼而戰，也知道爲誰而戰。敵人的最小的戰鬥單位是小隊，如果把小隊長打死，這一隊就喪失了戰鬥能力。而八路軍的最小的戰鬥單位，是每個戰士

內政部發新登記證警字第時捌陸伍號

，打到敵一個連，一個排，一個班，直到最後一個，都能夠進行戰鬥。並且敵人的優勢，只有在一定地域和一定時候才能發生作用，如果敵人分散了兵力，分頭出擾，八路軍集中一定數量的兵力和裝備，來進攻分散了的某一路敵人，這就是敵之優勢劣勢，而變之我劣勢爲優勢。而事實上，八路軍經常在各種鬥爭的配合下，以極少的兵力，擊潰了敵大敵人的進攻。

總括三個月的反「掃蕩」，主力部隊和敵人進行了大小二、〇九三次戰鬥，在每次戰鬥中表現出八路軍的英勇指揮藝術，到最後，這「掃蕩」，阻擊、追擊敵人，阻礙了敵人的行動，粉碎他各個「掃蕩」計劃，使敵人每一個行動都付出很大的代價。這兒，我如具體地舉例子，便可以了。敵人和八路軍的實際戰鬥力如何了。九月底，敵偽四千餘，圍攻阜平東北部的神仙山，八路軍的守備部隊還不到敵人的十分之一，只不過四百人，可支持了十二天之久，這還不算，又擊傷敵偽二百多，打落下一架飛機，繳獲了一挺重機槍，最後還把圍攻的敵人打退了。

另外像十月三日，七百多敵偽進攻唐縣西北之野山，八路軍不過二百餘的兵力，奮勇抵抗了敵四天之久，並且擊斃四十多敵人，終于放退了。再像三百多敵人侵入了曲陽于家寨，八路軍以十四挺輕機槍和三百多隻步槍的猛烈火力了，在且里村南山設伏，當敵人到時，即同時向敵人猛攻，敵人隊形馬上混亂，經過半小時，都無力還擊，後發敵次衝鋒，全被打退，就在這次戰鬥中，曾經有一班人在一高山上，擊退了十倍以上敵人的衝鋒。在且里山下，一百多個敵偽倒下來了，八路軍只傷亡了十六人。

軍事鬥爭和各種鬥爭的結合，八路軍成爲一隻攻無不取戰無不勝的勁旅。以上的事實，回答了我的疑問。我理解到：八年來爲什麼八路軍在敵後，不但没有被精銳的敵人消滅，反而一天一天強大起來的原因。（未完）

羣衆

第十卷 第十九期

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直隸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發行所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六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